

出土古代醫療相關文本的書寫與編次

金仕起*

本文討論古代醫療技術、知識的傳授與流動。過去，學者透過文本的內容分析，往往強調其「敬慎」、「禁秘」、「非其人不傳」的特色。這類印象並非無據，但主要憑藉的是文本書寫者、持有者的說明或宣示。本文嘗試另覓取徑，透過出土實物，檢視、比較相關文本的出土脈絡、載體材質與形制，文本的字跡與書體，以及文本的編聯、組綴情況，以瞭解它們是如何書寫、如何編次的？並據此推估它們可能以哪些形式流通、可能反映哪些知識傳習和流通的樣態？檢視後發現：一、這類文本常由多人參與書寫，一人獨立書寫的案例反而相對罕見。多人書寫的情況又可分為兩種：(一)是在同一材質上接續書寫，但未必都在短時間內一氣呵成；(二)是在不同形制的載體上分別書寫，然後再加以組綴編聯。換言之，書寫能力固然是參與這類文本建構的基本門檻，但文本並不總在密而不宣的封閉環境下，而是在某種相對開放的人際網絡中，甚至是在書手彼此互動、相互知情的情況下形成的。二、相關文本的編次往往視實際需要處置，未必拘於一律。有的以個別牘版書載單方行世，有的以合方聯編或合卷成書形式流通，有的則與非關醫療的文本合寫一處以便閱覽或度藏。這些現象除了一定程度反映醫療實務的需求多端、醫療相關知識的流通樣態多元，也說明文本體裁間的界限往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往是浮動的、具有因事制宜色彩，不盡與兩漢之交由國家主導形成的圖書分類架構一致。三、根據文本的形制與流通情況及《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淳于意的證言推測，醫療相關文本的閱讀、理解、應用、驗證至少可能存在兩類作法：(一)在師資引導下，由弟子亦步亦趨學習、討教為之；(二)由能夠識讀圖像、文字者自主理解、體會，並據此運用、檢討。總之，古代醫療技術、知識的傳授或流動樣態不一，遠比文本內容本身揭露得更為複雜。

關鍵詞：簡帛文本、醫療活動、醫學授受

一、前言

本文討論古代醫療技術、知識的傳授與流動。這裡所指古代，略以公元三世紀的漢、晉之際為下限，亦即文字的主要載體由竹、帛逐漸轉變為紙卷，¹當代學者所稱古代醫學典籍，²如《黃帝內經》、³《傷寒雜病論》、⁴《神

- ¹ 中國在公元三世紀以前，文字載體仍以竹、木為主，竹多見於中原，木多用於邊地，和氣候與地理條件有關。帛的價格相對來說比較昂貴，考古出土的帛書、帛信數量也少。錢存訓著，國家圖書館編，《錢存訓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卷1，《書于竹帛》，〈第7章紙卷〉，頁133-164；李均明，《古代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2；邢義田，〈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史料解讀之一〉，收入邢義田、劉增貴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古代庶民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附錄：帛信材料價格〉，頁286-288；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第2講，〈三種不同含義的「書」〉，頁59-60。
- ²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第4章，〈秦漢的醫學〉，第7節，〈古代的醫學典籍〉，頁93-113；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第4章，〈理論和實踐醫學的統一時期〉，頁21-56。
- ³ 現存《黃帝內經》，學者或稱「今本《黃帝內經》」，主要指《素問》、《靈樞》二書。現存《素問》，是宋太醫局據唐人王冰所注校正、重廣補注的；《靈樞》則源於宋人史崧的家藏舊本。這兩部書是否等同於《漢書·藝文志》所載《黃帝內經》十八卷，學者見解不一。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三世紀中葉，已有晉人皇甫謐所輯《黃帝鍼灸甲乙經》十二卷，係整齊《素問》、《鍼經》及《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所得，保留了不少現存《素問》、《靈樞》二書的內容，可謂《黃帝內經》的早期傳本。齊、梁之際，又有全元起的《素問》注本。隋、唐之間，則有楊上善編注《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是另一《黃帝內經》的重要傳本；不過該書於宋時散佚，今所見本，則主要是據日本仁和寺藏本所校。有關《黃帝內經》文本形成過程的重要研究如右，餘不俱引。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古亭書屋，1969)，頁1-59、209-237；山田慶兒，〈《黃帝內經》の成立〉，《思想》，第8期(東京，1979.04)，頁94-108；龍伯堅，《黃帝內經概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頁1-24；馬繼興，〈從《素問》王注探討《靈樞經》在唐代之三種古傳本〉，《天津中醫學院學報》，1986增刊(1986)，頁101-113；收入《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77-85；David Keegan, *The 'Huang-ti nei-ch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pil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ruc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h. D Dissertation, 1988)；廖育群，〈今本《黃帝內經》——《素問》與《靈樞》〉，收入《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頁51-76；李學勤，〈《素問》七篇大論的文獻學研究〉，《燕京學報》，第2期(北京，1996)，頁295-302；王玉興，〈關於《黃帝內經太素》的傳流概況〉，《天津中醫學院學報》，第9卷第4期(天津，1990.08)，頁36-37；孫非，〈《黃帝內經》年代學研究〉(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文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 ⁴ 《傷寒雜病論》的成書年代問題，可參錢超塵、溫長路，〈張仲景生平暨《傷寒論》

農本草經》等陸續纂輯成書的時代。⁵在這，所謂「醫療相關文本」，大體以《漢書·藝文志》所謂「方技」及若干「數術」圖書為核心；但「數術」、「方技」的概念興起於戰國，未必能涵蓋公元前四世紀及其以前的相關圖書，是以，我們仍以醫療相關文本概括稱之。⁶

過去，學者討論古代醫療技術、知識的傳授與流動，主要是透過文本的內容分析，特別是文本書寫者、持有者的說明或宣示。如山田慶兒注意古代醫療者的執業特色，他指出，春秋戰國時期既有在官守職或居家世業的定著醫療者，也有像扁鵲這類周行於列國的遊方醫療者；進入秦漢時期，倉公淳

版本流傳考略》，《河南中醫》，第25卷第1期(鄭州，2005.01)，頁3-7。

⁵ 《神農本草經》的成書時代問題，見大形徹，〈本草と方士の關係について〉，《人文學論集(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第8期(大阪，1990)，頁47-66；〈《神農本草經》の神仙觀〉，《東方宗教》，第77期(茨城，1991.05)，頁22-49；山田慶兒，《本草と夢と鍊金術と——物質的想像力の現象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

⁶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30，〈藝文志第十〉，頁1763-1781。數術，古書又稱術數，《漢書·藝文志》以為出於「明堂義和卜史之官」，但戰國文獻如《墨子·節用上》、《管子·形勢解》、《鶡冠子·天則》及《韓非子·姦劫弑臣》諸篇中的用法似乎和治政、御人之術意義更近。方技，又作方伎，《漢書·藝文志》以為「生生之具」，和維護、延續、更新生命的醫藥之術關係較大，見於《墨子·迎敵祠》、《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數術」、「方技」意義的相關討論可見石田秀實，《中國醫學思想史——もう一つの醫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3-154；Nathan Sivin, "State, Cosmos, 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 C.,"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 no.1 (1995): 5-37; Donald Harp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3-183; "Physicians and Diviners: The Relation of Divination to the Medicine of the Huangdi neijing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Thearch)," *Divination et rationalité en Chine ancienn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1 (1999): 91-110;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頁45-105；〈中國早期數術通考〉，《法國漢學》，第6輯(北京，2002.04)，頁68-77；《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21-98、207-403；《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9)，頁287-320；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3-52；李零，〈戰國秦漢方士流派考〉，收入《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97-128；《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24；《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頁426-467；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第1章，〈緒論〉，頁8-12。比較特別的是，李零認為兵書、數術和方技都是技術書，「兵書是技術類的第一種」，見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第7章，〈兵書略〉，頁150。

于意則近乎兼有遊方醫與定著醫角色的綜合體。與在官任職或居家世業的醫療者不同，遊方醫講究非其人不傳，為慎重其事，師徒授受醫術往往於事前要求齋戒、選擇吉時，並要求歃血盟誓；授受的途徑，則或先以口傳、再書於竹帛，以形成文本，或先授以既存文本，再令其誦習，並予講解，或以實作驗證、修正所學。醫療知識藉著形成文本，或透過講解、驗證、論辯，以修正文本，而更新醫療知識，並使其朝理論化或體系化方向發展。倉公個人的經驗則反映因文本流通所促成的轉變：在他是學生時，是老師一對一的全面傳授；在他是老師時，則是根據不同來學者的特質和需求，分別教學和授予不同文本。而古代醫學文本的體裁特色之一在於，他們多以不同傳說中的帝王君臣問對表達，不同的傳說人物猶如不同社群或學派的淵源，社群或學派的後學據此識別其特色，並學習、傳授和發展其學。⁷對於這類特色，李零也指出，古代的王宮貴族原來就非常重視血統宗法、世系譜牒，春秋戰國以後，由於地緣關係造就大量新的人際關係，技術之家同樣講究學術淵源，但因非父子相傳或師弟相授，往往形成家法不明或授受系譜不清問題，因此透過依托傳說人物的途徑形塑學術認同，並以人物的問對引導、推進教學。⁸

李建民則統整山田慶兒、李零之說，並就其未盡之處，進一步提出了禁方書、依托和正典幾個核心概念，以便理解古代醫學傳授的特色。他強調，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三世紀間，論者因醫學關乎死生，被視為天人之秘，為了控制其技術效驗，主張不得妄傳、非其人不傳，因此又將具特殊效驗的技術及文本稱為「禁方」或「禁方書」。師徒之間透過秘密受書儀式傳授知識，典籍、師資、經驗難以分割，典籍又具有建立師徒關係、區別我羣與他羣的功能。漢、魏之間，受書儀式式微，典籍、師資、經驗的關係亦從此分化。依托的對象往往是傳說中的「古聖人」，實又多指現實中的帝王，則賦予醫學典籍神聖性。它既用以追溯其技術世系，同時也用來形塑學術傳統。聖人

⁷ 山田慶兒有關中國古代醫學傳授問題的討論可以參看〈醫學の傳授〉、〈扁鵲傳說〉，收入《夜鳴く鳥：醫學・呪術・傳說》（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53-223；〈《黃帝內經》——中國醫學の形成過程〉，收入《中國醫學の思想的風土》（東京：潮出版社，1995），頁47-75；《中國醫學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1999），第5章，〈《黃帝內經》の成立〉，頁259-281。

⁸ 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說「黃老」〉，收入《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30-31、280-282。

對話的依托體例，從《黃帝內經》到《難經》有著格式化、公式化的傾向。至於正典化的過程則起於公元三世紀的漢、魏之間，其意義不在賦予任何新的醫學文本以正典地位與權威，而是不斷地把既有的醫學典籍的正典性挖掘出來。也就是經由重新編輯、命名、注解舊有經文來重建醫學的秩序與權威。⁹

相對於此，楊勇同意李建民的觀察，認為「禁方」具特殊效驗，但他也注意到廖育群的意見，強調「禁方」與國家的淵源，並將其置於病方流通的整體脈絡審視。他指出，戰國秦漢時期，病方主要有醫者私相授受、地方進獻、國家頒發、民間傳抄四種主要形式。病方在以國家、醫者、個人為主體的流轉中，逐漸形成了國家與民間兩大流傳統序。在政府的流傳體系內形成了「常方」、「經方」等名稱，在民間則形成了「禁方」之名。「常方」與「經方」都是國家借用行政力量凝聚的醫療資源，從病方造作的角度而言，他們都與民間流傳的病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國家利用醫政體系搜集和頒下病方，促成病方的跨地域流動，這些病方原來或來自私人，後來又進入私人收藏，也因此形成了病方在政府與民間的雙向流動。出土文獻中有「禁方」存在的實例，「常方」與「經方」可能也以不同的形式混雜于出土病方之中，因此，他們雖然名稱有異，但部分可能只是名異而實同。¹⁰要之，楊勇的研究提示了醫療相關知識，特別是「病方」這類文本承載的知識，可能在不同主體間經由流動而相混的理解。事實上，晚近廣瀨薰雄重新排比敦煌出土漢簡，也發現漢武帝(公元前 156-87 年)名臣韓安國受賜醫藥方的故事曾被編入醫書，並流傳到邊地。¹¹總之，上述的事例說明，出土戰國秦漢時期病方這類

⁹ 李建民的相關論述，請參李建民，〈中國古代「禁方」考論〉(原發表於1997年)，收入《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頁149-206；〈禁方書、聖人與正典〉，《讀書》，第8期(北京，2003.08)，頁64-70；〈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新視野〉，《新史學》，第15卷第3期(臺北，2004)，頁203-225；《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第2章，〈古典醫學的知識形式〉，頁69-130。

¹⁰ 「常方」見於漢元帝(公元前75-33年)時期的居延漢簡，「經方」之名見於《漢書·藝文志》。楊勇，〈流動中的病方：戰國秦漢時期病方的流傳與命名〉，《人文論叢》，第2期(武漢，2015.12)，頁112-120。廖育群的意見主要見於李建民〈中國古代「禁方」考論〉一文所附通信。

¹¹ 廣瀨薰雄，〈敦煌漢簡中所見的韓安國受賜醫藥方的故事〉，收入《簡帛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508-515。

文本的組成形態和流通途徑可能比傳世文本所能呈現的樣貌更為多元。

相對於上述，本文討論古代醫療技術、知識的傳授與流動，嘗試另覓取徑，透過出土實物，檢視、比較相關文本的出土脈絡、載體材質與形制，文本的字跡與書體，以及文本的編聯、組綴情況，以瞭解它們是如何書寫、如何編次的？¹²並據此推估它們可能以哪些形式流通、可能反映哪些知識傳習和流通的樣態？希望藉此提出審視、理解相關課題的另一種可能。

整體而言，截至目前的出土古代醫療相關文本，大概可以分為《漢書·藝文志》所謂「數術」和「方技」兩大類。前者接近「數術」中的「蓍龜」、「雜占」，後者則涵蓋「方技」四種之書，也就是包括「醫經」、「經方」、「房中」與「神僊」在內的圖書。接近「蓍龜」和「雜占」的文本，大體見於殷商至戰國時期，並多集中於戰國時期。出土地域則散佈河南、陝西、山西、湖北及湖南等地。體裁則以和疾病有關的卜筮禱祠與占夢文本為大宗。而與「方技」四種接近的文本，主要見於戰國晚期到兩漢時期，出土文本的遺址分佈於從湖北、湖南、四川到甘肅、內蒙等地域。體裁則以接近「經方」的「病方」為大宗，其他如近似「醫經」的「脈書」、「診法」、「刺數」，類乎「房

¹² 這裡說的書寫，視文本材質不同，《墨子》早有「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盃，傳於後世子孫者知之」、「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或「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的說法；《呂氏春秋·求人》也有「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盃」的描述。再者，許慎《說文解字·敘》指出：「著於竹帛謂之書」，《說文解字·聿部》：「書，箸也。」換言之，從其狹義，書寫大概原指「書於竹帛」、「著於竹帛」，也就是以毛筆蘸墨寫於竹木或繒帛等材質之上。但本文為行文方便，從其廣義，舉凡鐫刻文字於甲骨、碑石，或融鑄文字於鐘鼎，都以「書寫」概括。這裡說的編次，則主要和竹木及繒帛材質的文本載體有關，同時也涉及了什麼是「書」的認識。古代中國的「書」和溝通訊息及知識經驗的成文化有關，錢存訓認為古代中國的「書」的起源，應當追溯至竹簡和木牘的編以書繩、聚簡成篇；李零則指出，依時序演變，「書」曾存在並兼有三種涵義：文字、檔案與著述。上所徵引，見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4，〈兼愛下第十六〉，頁120-121；卷13，〈魯問第四十九〉，頁469；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2，〈慎行論第二〉，「求人」，頁1524；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三篇下，〈聿部〉，頁117；卷15之上，〈敘〉，頁754。至於古代文本載體、書寫方法和書寫工具的說明，見錢存訓著，國家圖書館編，《錢存訓文集》，卷1，《書于竹帛》，頁3-194；錢存訓著，國家圖書館編，《錢存訓文集》，卷1，《書于竹帛》，〈第5章竹簡和木牘〉，頁88；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第二講：三種不同含義的「書」〉，頁39-70。

中」的「胎產」、「合陰陽」，及和「神僊」相仿的「去穀食氣」、「引書」則基本齊鼓相當。以下，便依上述次第，逐批檢視這類文本的書寫與編次情況。

二、殷商至戰國的「著龜」與「雜占」文本

公元前三世紀，主張節適飲食、情欲、起居以養生的《呂氏春秋·盡數》曾指出：

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¹³

作者在這陳述的，與其說是事實，毋甯更像是企圖以某種想像的歷史，針砭當時透過卜筮禱祠維護生命、逐除疾病的風氣。從現存文本看來，卜筮禱祠等相關技術反而是古人關切生命或回應疾病的常見方法，古今之人未必賤之，也不見得都以其為末。¹⁴和古代卜筮禱祠傳統關係密切的技術與文本，若以《漢書·藝文志》為例，其中的「數術」略有「著龜」十五家、「雜占」有十八家。「著龜」，大體透過卜筮以預占吉凶；¹⁵「雜占」，包括占夢、誥咎、禳祀、請禱、請雨、候歲、相土、相蠶等術。¹⁶漢人雖將卜筮和占夢歸入「數

¹³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盡數〉，頁138-146。

¹⁴ 這方面的事例可以參見林富士，《漢代的巫者》；《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5)；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

¹⁵ 顏師古注說：「龜曰卜，著曰筮」，此即「著龜」之義。其「錄」說：「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見班固撰，《漢書》，卷30，〈藝文志第十〉，頁1771。

¹⁶ 其「錄」說：「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託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託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託興，人無繫焉，託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

術」，但其實是某種和「方技」更切近的「生生之具」。

以卜筮禱祠和占夢回應疾病，殷商卜辭已有所反映。卜辭依發動占問的主體是商王或王以外的成員，可以分為「王卜辭」和「非王卜辭」兩類。¹⁷當然，實際占問和紀錄命辭、占辭和驗辭的，可能是不同的真人。和醫療相關的占問，可以分成疾病和夢象兩大範疇。占問疾病的形式一般是正反兩面占問，以確認是否發生疾病、病情是好轉或惡化。¹⁸占問的內容也往往因患病者的身分而有詳有略。如商王患病，「王卜辭」中占問的患病部位、證狀或病情通常較具體、詳細；若干大族族長患病，「非王卜辭」中的占問亦然。但當患病者不是商王或大族族長時，不論「王卜辭」和「非王卜辭」，通常只見占問患者是否無害、病情有無起色等較籠統的問題；僅少數事例具體、細緻描述了患病部位、證狀或病情。換言之，卜辭占問疾病內容的繁簡，往往可能反映患病者在權力網絡中的位置。倘患者的位置重要，占問的內容就較詳；如果不是特別重要，占問的內容就較略，比較像是占問發動者向患者表達的善意和問候。¹⁹與占夢有關的卜辭，主要關切夢象是否預示了發動占

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鵠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可見「雜占」與卜筮相參，而「夢占」是其中的要項。班固撰，《漢書》，卷30，〈藝文志第十〉，頁1772-1174。

¹⁷ 1936年董作賓已發現卜辭中有「子卜」及「子卜貞」等非王之卜人占卜之例。此後，貝塚茂樹、陳夢家、李學勤等人在1940至1960年代間也續有發現，「王卜辭」、「非王卜辭」的分類遂廣。見董作賓，〈五等爵在殷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3分(南京，1936)，頁413-430；小川茂樹(貝塚茂樹)，〈殷代金文に見えた圖象文字叢に就いて〉，《東方學報》，第9冊(京都，1938.10)，頁55；貝塚茂樹，《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東京：弘文堂，1949)；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4、5章，頁135-206；李學勤，〈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考古學報》，第1期(北京，1958.03)，頁43-74；林澐，〈從武丁時代的幾種「子卜辭」試論商代的家族形態〉，《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08)，頁314-336；黃天樹，〈關於非王卜辭的一些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4期(西安，1995.12)，頁125-131；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¹⁸ 李學勤，〈關於甲骨的基礎知識〉，《歷史教學》，第7期(天津，1959.07)，頁20-22；喻遂生、鄒淵，〈甲骨文兩段式命辭對貞句的組合形式及語義指向〉，《漢字漢語研究》，第3期(鄭州，2019.09)，頁3-17轉126。

¹⁹ 1943年胡厚宣先生發表〈殷人疾病考〉以後，探討甲骨文中占問疾病資料的論著不少，這裡僅列比較可據者，如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中央

問者的吉凶。卜辭紀錄的夢象包括人物、自然現象、行為舉措、實物、疾病、災異、禽獸、鬼怪等，其中和疾病有關的夢占多見於「王卜辭」，主要詢問有無疾病、所患疾病是否即夢象所示之病。²⁰

此外，殷商時期醫療相關卜辭尚有兩項與出土脈絡有關的問題值得注意：一、與疾病、夢象有關的占問多出現於師組、賓組及「非王卜辭」，少數見於歷組、出組卜辭。意思是，這類占問活動似乎在武丁至祖庚時期比較集中。出組二類以後，即商王祖甲以後，相關的卜辭迄今未見。原因何在？尚難判斷。²¹二、甲骨的使用情況及用後的處理有幾個重要特徵：(一)甲骨在經過鑽鑿灼燒、卜兆占問、鏤刻紀錄，和經過一段時間驗證後，仍受到一再使用。(二)不論有字無字、整片或破碎，甲骨多以分批、有序形式出現於不同遺址的灰坑，或廢棄的窖穴、水井中。(三)即便占卜場所在安陽以外地區，商人仍多將用後甲骨攜回安陽宗廟附近掩埋。(四)掩埋於灰坑中的甲骨形式上雖是廢棄物，但作為提供參考的檔案而受到有意的存儲、基於甲骨的神聖性而受到慎重埋藏，或作為習卜之物而受到回收再利用的幾種可能都存在。²²總之，儘管目前尚無法確定有關疾病、夢象的卜辭是否係特定時期的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2分(臺北，2001)，頁339-391；姚萱，〈非王卜辭的「瘳」補說〉，《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4期(石家莊，2012.07)，頁108-113；趙鵬，〈關於疾病、夢幻類卜辭的幾點思考〉，《出土文獻研究》，第18輯(上海，2019.12)，頁1-15。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疒」的用例不限於指涉疾病，如描述速度快的副詞，如「雨疒」、「疒弓」。見喻遂生，〈《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疾」字〉，《蘭州學刊》，第10期(蘭州，2009.10)，頁158-160。

²⁰ 有關甲骨文中占問夢的資料研究，見丁山，〈說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2分(北平，1930.01)，附錄二〈說夢〉，頁245-247；胡厚宣，〈殷人占夢考〉，收入《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臺北：大通書局影1944年齊魯大學本，1972)，頁447-466；宋鎮豪，〈甲骨文中的夢與占夢〉，《文物》，第6期(北京，2006.06)，頁61-71；張秋芳，〈甲骨卜辭中夢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11)；趙鵬，〈關於疾病、夢幻類卜辭的幾點思考〉，頁1-15。

²¹ 許進雄，《甲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2分，頁339-391；趙鵬，〈關於疾病、夢幻類卜辭的幾點思考〉，頁1-15；莫伯峰，〈殷商祖甲改革與貞人「何」〉，《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8輯(上海，2019)，頁96-133。有關卜辭的分期，可參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²² 段淦，〈卜用甲骨的用後處理〉，《文史知識》，第1期(北京，1993.01)，頁23-26；

產物，但這類卜辭似乎具有類似官文書的意義，能夠近用這類文本的人物不但需要具備相當的文字閱讀與書寫能力，在身分上恐怕也多以商人王室或大族成員為核心，不是任誰都可以接觸這類資料。對權力核心圈外、不識之吾的人群來說，它們不是開放的文本，也不可能近用。對殷商王室或大族成員來說，這些書載於甲骨，占問疾病與夢象的卜辭在不同貞人間應當仍是具相當開放性的文本。

西周時期也有甲骨出土，但現存有字甲骨的整體數量相當有限。就目前所見，可能與醫療相關的資料僅有兩片，一片為卜骨，出土於山西趙洪縣坊堆村群墓遺址，書載「三止(趾)又(有)疾，貞」。²³一片為卜甲，出土於陝西岐山鳳雛村建築基址 31 號灰坑，學者對其中的疒部一字釋讀不一，但大體同意刻辭提到八月辛卯，占卜者似乎曾病發的遭遇。²⁴從兩件文物出土的情況看，坊堆村出土卜骨的探溝中，尚有一穿孔的蛤蜊殼和一件新月形的骨飾，鄰近地點為西周、漢至唐的墓葬，出土不少隨葬物，但無法斷定卜骨是否即

劉一曼，〈安陽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關問題〉，《考古》，第5期(北京，1997.05)，頁51-61；〈論殷墟甲骨的埋藏狀況及相關問題〉，《三代考古》，(北京，2004)，頁354-370；張國碩，〈試論殷人對甲骨的處置方式〉，《殷都學刊》，第2期(安陽，2003.06)，頁19-23。

²³ 這是1954年10月山西趙洪縣坊堆村群墓遺址中西部的第5號探溝出土的一片有字卜骨，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洪趙縣坊堆村古遺址墓群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第4期(北京，1955.04)，頁46-54；暢文齊、顧鐵符，〈山西趙洪縣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參考資料》，第7期(北京，1956.07)，頁27，圖見頁20；李學勤，〈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考資料》，第11期(北京，1956.11)，頁16-17。有關的釋文，尚可參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第1篇，〈概論西周甲骨的發現與研究〉，頁13-14。

²⁴ 徐錫臺釋作「痛」，王宇信從陳全方說，釋作(疒+省+又)，意指夢，葛英會則讀作(疒+卓)。這是1979年2月在陝西岐山鳳雛村周初建築基址西廂2號房第31號灰坑發現的第3片卜甲。必須指出，31號灰坑的出土情況至今未見報告正式揭示。見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第10期(北京，1979.10)，頁27-37；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西周甲骨文〉，《文物》，第10期(北京，1979.10)，頁38-43。31號灰坑有字卜甲的釋讀，則見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成都，1982.05)，頁305-434；徐錫臺，〈周原出土卜辭選釋〉，《出土文獻研究》，第1輯(上海，1985.06)，頁64；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第1篇，〈概論西周甲骨的發現與研究〉，頁149-150；徐錫臺編著，《周原甲骨文綜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第2章，〈周原甲骨文文字考釋〉，頁114；葛英會，〈談岐山周公廟甲骨〉，《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2006年)，頁193-196。

隨葬物。²⁵鳳雛村出土卜甲的 31 號灰坑則打破原建築基址，係該建築遭焚後形成。有的學者依卜甲零碎的現狀推測應係廢棄物；有的則有見於該灰坑甲骨堆疊有序，推測原來當係有意識的掩埋，在該建築遭焚後才移置該處。²⁶無論如何，根據上述，周人在疾病時應當也有透過甲骨占問鬼神的行為，但在占問後是否如商人作法，也將甲骨度藏以便參考，無法斷定。就目前考古報告的內容來看，我們僅能推測岐山鳳雛村出土的卜甲可能來自周人統治階層，而無法判斷坊堆村遺址卜骨原來的主人是誰。要之，從殷商到西周，甲骨卜辭的確可以反映殷周藉由卜筮禱祠回應疾病的風氣，但透過甲骨卜筮這類前知來事的知識技術似乎仍主要由統治階層壟斷。

公元三世紀以前，書寫的載體主要以竹木和繒帛為主。繒帛因為價格不菲，因此作為書寫載體的數量遠不及竹木簡牘。傳世文獻《尚書·多士》曾指出：「惟殷先人，有冊有典」，²⁷顯示殷商時期似乎即已編聯竹木簡牘形成典冊；不過，也許受限於客觀的物質保存條件，公元前五世紀以前的竹木簡牘至今未見出土。²⁸公元前五世紀以後，則有不少墓葬出土卜筮禱祠簡。以

²⁵ 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洪趙縣坊堆村古遺址墓群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頁46-54；暢文齊、顧鐵符，〈山西趙洪縣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參考資料》，頁27。

²⁶ 葛英會，〈談岐山周公廟甲骨〉，頁193-196；郭明，〈周原鳳雛甲組建築H11「龜室說」質疑——兼論商周時期甲骨埋藏問題〉，《四川文物》，第6期(成都，2014.12)，頁32-38；種建榮，〈試論西周甲骨的埋藏方式——以周公廟刻辭甲骨的出土為例〉，《文博》，第3期(西安，2018.06)，頁21-27；趙藝蓬等，〈西周甲骨文的度藏問題初探〉，《文博》，第5期(西安，2018.10)，頁58-63轉50。周公廟遺址的考古報告見周原考古隊，2003年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古代文明》，第5輯(北京，2006)，頁151-187，另見彩版1-16。

²⁷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16，〈多士第十六〉，頁503。

²⁸ 中國在公元三世紀以前，文字載體仍以竹、木為主，竹多見於中原，木多用於邊地，和氣候與地理條件有關。帛的價格相對來說比較昂貴，考古出土的帛書、帛信數量也少。錢存訓著，國家圖書館編，《錢存訓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卷1，《書于竹帛》，〈第7章紙卷〉，頁133-164；李均明，《古代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2；邢義田，〈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史料解讀之一〉，收入邢義田、劉增貴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古代庶民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附錄：帛信材料價格〉，頁286-288；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第2講，〈三種不同含義的「書」〉，頁59-60。

下，即依墓的下葬年代逐一檢視相關簡冊的書寫、編次及體裁。²⁹不過，必須先指出的是，個別墓葬出土的簡牘保存條件不盡相同，整理報告公開的資訊內容不一，研究的步調或有先後、研究的程度或充分或不充分，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理解上或繁或簡的不同。

1.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卜筮祭禱簡。墓主是平夜君成，身分等級低於楚王，但高於「大夫」和「元士」。下葬年代據估計，當在公元前 398-377 年前後，也就是楚悼王(公元前?-381 年)到楚肅王(公元前?-370 年)之間。³⁰竹簡出於墓的南室，分為甲、乙兩區，總計 1571 枚，大部分已經盜墓者擾動。原簡長度不詳，寬度一般為 0.8 公分，最大達 1.2 公分，窄者約 0.6 公分。大部分墨迹清晰，由多人書寫而成。竹簡的內容大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卜筮祭禱紀錄，占絕大多數；另一類是遺策，即他人饋贈給墓主的物品清單，學者又稱之為贈書，數量很少，僅 20 餘簡。卜筮祭禱又可分為三種，第一種與包山楚簡(詳後文)中的卜筮祭禱簡類似，主要是墓主平夜君成生前的卜筮祭禱紀錄，從其字跡可以判斷當係多人、多次分別書寫形成。占卜的內容以求問病情為主，由前辭、命辭、占辭等部分組成。前辭是簡文起首的部分，包括舉行卜筮禱祠的時間、貞人名、卜筮用具名稱和請求貞問者的姓名。命辭即貞問事由，貞問之事主要是平夜君成的疾病吉凶。占辭是根據卜筮的結果所作的判斷，指出疾病的吉凶。禱辭是為解除近期內的憂患向鬼神祈禱，請求保佑和賜福之辭，及可以解脫憂患的辦法。第二種是自稱「小臣成」者，

²⁹ 這類竹木簡的一般性研究，可參馮華，〈卜筮簡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第2期(北京，2012.04)，頁3-8；蔡麗利，〈楚卜筮簡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盧醒辰，〈楚簡所見卜筮祭祀研究〉(重慶：西南大學考古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³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柒結語〉，頁180-185；劉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以及相關問題〉，《長江大學學報》，第1期(荊州，2004.02)，頁5-8；何琳儀，〈新蔡竹簡選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3期(合肥，2004.05)，頁1-11；李學勤，〈論葛陵楚簡的年代〉，《文物》，第7期(北京，2004.07)，頁67-70；〈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第3期(北京，2011.03)，頁70-74；〈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鄆郢〉，《江漢考古》，第2期(武漢，2011.04)，頁108-109；劉彬微，〈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楚文化研究論集》，第7集(長沙，嶽麓書社，2007)；鄒尚白，《葛陵楚簡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第2章，〈葛陵楚簡的整理、年代及相關問題〉，頁29-139。

也就是墓主平夜君成自己的祈禱紀錄，留存的數量很少，字跡單一。第三種較單純，是可能與平夜君成職務有關的祭禱記錄，不見占卜，但可以看出是多人按一定格式分別書寫。³¹從前兩種卜筮祭禱簡的內容看，這大概是由平夜君成及其近侍，在其疾病期間，隨著卜筮祭禱活動編寫的紀錄。

2.湖北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出土卜筮禱祠簡。墓主是邸(方+傷)君番(乘+力)，爵位當是楚國上卿，可能是武官，官職在令尹、上柱國之列。下葬年代據估計，約在公元前 340 年前後，即楚宣王(公元前?-340 年)或楚威王時期(公元前?-329 年)。竹簡主要置於棺槨的西室，一部分夾在漆皮中，壓在兵器桿下，被盜墓者踩斷；一部分放在竹筍內，保存較好。整簡長 64-71 公分，寬 0.5-0.8 公分。卜筮記錄完整無缺的有 50 支，殘(包括僅缺一點甚或文字不少者，殘缺甚多者)110 支，約計 2700 餘字。多數是為墓主卜筮禱祠的記錄，內容有三類，一是墓主貞問「侍王」是否順利；二是貞問邸(方+傷)君疾病是否加劇或痊癒；三是貞問遷居新室是否「長居之」。卜辭的格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先記年月日，再記卜人所用占卜工具、所問事項，及占卜結果；另一種是不記年月日，只記占卜人名、占卜工具及驗辭。驗辭的通常格式是「占之吉」、「占之恒貞吉」、「自利訓」；有的簡文在句末或句中還記錄了卜筮的卦象。簡文記錄十餘貞人以多種占卜工具先後分四個年份為墓主貞問。禱祠的祖先有「卓公」、「惠公」；鬼神有「司命」、「司禍」、「地字」、「雲君」、「大水」、「東城夫人」等。³²與葛陵楚墓的情形類似，此處的疾病卜筮禱祠簡大概也是由邸(方+傷)君近侍，因其疾病，而隨著卜筮祭禱活動，由多人編寫形成的紀錄。

³¹ 陳偉，〈新蔡楚簡零釋〉，《華學》，第6輯(北京，2003.06)，頁95-98；〈葛陵楚簡所見的卜筮與禱祠〉，《出土文獻研究》，第6輯(上海，2004)，頁34-4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頁167-173、186-231；賈連敏，〈新蔡葛陵楚簡中的祭禱文書〉，《華夏考古》，第3期(鄭州，2004.09)，頁89-101轉108；蔡麗利，〈新蔡葛陵楚墓卜筮簡集釋〉(長春：吉林大學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鄒尚白，《葛陵楚簡研究》。

³² 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第1期(北京，1982.01)，頁71-116；晏昌貴，〈天星觀「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修訂稿)〉(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http://47.75.114.199/show_article.php?id=31，2005年11月2日，瀏覽日期2020年10月23日)；許道勝，〈天星觀1號楚墓卜筮禱祠簡釋文校正〉，《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3期(長沙，2008.05)，頁8-14；蔡麗利，〈楚卜筮簡綜合研究〉，頁6-7。

3.湖北江陵望山1號楚墓出土卜筮禱祠簡。墓主(郢+心)固應當是楚王親近的侍者，身分約當下大夫等級。據整理者估計，他的下葬年代約當楚威王(公元前?-329年)或楚懷王(公元前?-299年)前期。該墓出土文物相當豐富，其中的竹簡出於南邊箱的東部，疊壓在漆木器下面。竹簡保存情況不佳，全數殘斷，當時應是在簡文書寫之前完成編聯的。殘簡最長的39.5公分，最短的僅1公分多，一般多在10公分以下，寬約1公分左右，厚度約0.1公分；經拼接後，共得207枚簡，最長的為52.1公分，一般長度約在15公分左右。簡的內容主要是為墓主卜筮禱祠的記錄，包括墓主出入侍王、仕進和疾病吉凶三方面。其格式通常先記卜筮的時間，後記卜筮的工具，再記所問事項與卜筮結果，最後則是為墓主求福去疾禱祠。從簡文內容看，為墓主(郢+心)固卜筮的疾病主要有心病、不能飲食、足骨病、首疾、胸疾等；占問的結果包括不死、吉、少遲瘥、瘥等。為墓主治病驅祟的禱祠對象包括東大王(楚簡王)、聖王(楚聲王)、(郢+心)王(楚悼王)等楚國先王，還有(郢+心)固的先君東(宅+邑)公、王孫臬等，並有后土、司命、大水(大江之神)、山川、(行+示)、(禘+大)等鬼神。禱祠的方法有(乂+興)禱、賽禱、饋祭、月饋等多種。為墓主卜筮疾病的真人不止一位，年月日也不盡相同，是多次而非一次卜筮的記錄。³³

4.湖北荊門十里鋪王場村包山2號楚墓出土卜筮禱祠簡。墓主邵(力+它)應是左尹之官，主管楚國司法工作的高階官員，身分低於令尹、大司馬等職官，相當於大夫等級。他的下葬年代推測約當楚懷王(公元前328-299年)前期，公元前316年前後。該墓出土的竹簡有448枚，分別出自東室、南室、西室和北室，保存基本完好。竹簡的內容包括司法文書、卜筮禱祠記錄和遺策。書寫遺策的竹簡製作比較粗糙，卜筮禱祠簡相對精細。卜筮禱祠簡主要出於北室中部靠北牆板偏西處，有字簡54枚(第197號至第249號)，無字簡3

³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4-7；圖版，頁19-50；釋文與考釋，頁68-10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208-214；陳偉，〈望山楚簡所見的卜筮與禱祠——與包山楚簡相對照〉，《江漢考古》，第2期(武漢，1997.04)，頁73-75轉72；許道勝，〈江陵望山楚簡研究述評〉，《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5期(長沙，2005.09)，頁11-19。

枚，狀況基本良好。54 枚簡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貞問類，一是禱祠類。禱祠類 4 枚，各枚簡自為起訖、獨立成文，分別記錄兩天內對四類禱祠對象進行祭禱。貞問類 50 枚，可分為 22 組，各組結構大致雷同，一般包括前辭、命(貞)辭、占辭、禱(效)辭，和第二次占辭等部分，有的還有禱祠記錄和驗辭。前辭是簡文起首的部分，包括舉行卜筮禱祠的時間、貞人名、卜筮用具名稱和請求貞問者的姓名。命辭即貞問事由，貞問之事主要是左尹邵(力+它)出入宮廷侍王是否順利、何時獲得爵位，及疾病吉凶三個方面。占辭是根據卜筮的結果所作的判斷，首先指出長期的休咎，然後再指出近期的吉凶。禱辭是為解除近期內的憂患向鬼神祈禱，請求保佑和賜福之辭，及可以解脫憂患的辦法。第二次占辭是在祭禱鬼神後，根據鬼神的指示所作的最後判斷之辭。卜筮之事分兩類，一是每年卜筮一次，可以稱作「歲貞」；一是以疾病為占問事項，視病情而占，可以稱作「疾病貞」。疾病貞的命辭均圍繞疾病和病情展開，前者如心疾、腹疾、腹心疾、上氣、少氣、不內食、不甘食、童病；後者如久不瘥、殤、少未已、難瘥、有孽。同時，又期待毋有恙、毋有咎、速瘥、良瘥、毋死。禱祠簡一般包括前辭和禱辭兩部分。前辭包括禱祠的時間和禱祠者，記時方法與卜筮同，也有不記錄禱祠者的。禱祠的種類包括(羽+能)禱、(與+止)禱和賽禱。(羽+能)禱的對象限於墓主邵(力+它)本氏的近祖和直系先人，包括楚昭王和墓主的高祖、曾祖、祖父、父等人。(與+止)禱的對象有先祖、父母、兄弟及山川和各種神祇。賽禱又稱塞禱，即回報神靈賜予的福祐。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簡的簡長有三種，一種在 69.1 到 69.5 公分之間，一種在 68.1-68.5 公分之間，一種在 67.1-67.8 公分之間，寬度基本在 0.7-0.85 公分之間，個別達 0.95 公分。從竹簡上的契口殘存的絲線或絲線痕跡看來，原竹簡的編聯應是在文字書寫完成後才進行的。從字體、筆鋒及書寫習慣看來，這批竹簡可能由多達 8 人書寫而成。³⁴

³⁴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265-275、330-333；彭浩，〈包山二號楚墓卜筮和祭禱竹簡的初步研究〉，《包山楚墓》，上冊，附錄二三，頁555-563；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釋文頁32-37；吳郁芳，〈包山二號墓墓主昭佗家譜考〉，《江漢論壇》，第11期(1992.11)，頁62-64；陳偉，〈試論包山楚簡所見的卜筮制度〉，《江

5.湖北江陵廟湖魚場秦家嘴 1 號、13 號與 99 號楚墓出土卜筮竹簡。秦家嘴發掘了 32 座楚墓，這是其中出土卜筮簡的墓。這三座墓都是有墓道的一槨一棺墓，共出土殘簡 41 枚。墓葬的下限年代為公元前 278 年，約當楚頃襄王(公元前 329-263 年)後期。墓主們的具體身分不詳，但不致太低。1 號墓的竹簡出土在邊箱的底層，上層堆放著垮塌的分板和車馬器。竹簡均殘斷，共出殘簡 7 枚(段)，主要為「祈福於王父」等禱祠文字。99 號墓竹簡一部分放在邊箱後端底層，一部分散落在棺室後端，簡均殘斷，計有 16 枚(段)，內容為「貞之吉無咎」及少量遺冊。12 號墓竹簡出自邊箱頭箱一端的底層，簡均殘斷，字迹不清，共出殘簡 18 枚(段)，為「占之日吉」等占卜內容。據有限的殘簡視之，其格式似乎近於包山 2 號楚墓所出卜筮禱祠簡。卜筮簡蓋先書年月日，再寫欲占問之事、占問的方法，及占問的結果。禱祠簡則書寫禱祠之年月日、賽禱之物、禱祠的鬼神、禱祠之事及再次禱祠後的結果。³⁵

6.湖北荊州市荊州區(原江陵縣)紀南鎮的棗林鋪，又有唐維寺 126 號墓、熊家灣 43 號墓出土戰國楚簡，同樣涉及了疾病吉凶的卜筮貞問。值得注意的是，唐維寺 126 號墓的墓主名「產」，身分可能是「元士」，下葬年代約當戰國中期後段。出土的 8 枚竹簡沒有編聯痕跡，字跡不一，即使是同一真人占問的紀錄亦復如此，可見簡文並不都是真人親筆，而可能有助手代筆。熊家灣 43 號墓主名「嬀」，應為女性，身分可能為士一級，下葬年代約當戰國晚期前段。³⁶由於出土的時間比較晚近，所得瞭解的情況尚很有限。

漢考古》，第1期(武漢，1996.02)，頁86-89；《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頁150-180；吳郁芳，〈包山楚簡卜筮簡牘釋讀〉，《考古與文物》，第2期(北京，1996.02)，頁75-77；工藤元男撰，陳偉譯，〈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構造與系統〉，《人文論叢》，2001年卷(武漢，2002.10)，頁78-93；李守奎，〈包山卜筮文書書迹的分類與書寫的基本狀況〉，《中國文字研究》，第1輯(上海，2007.09)，頁63-67；朱曉雪，〈包山楚墓文書簡、卜筮祭禱簡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馮華，〈包山楚簡成套卜筮辭中的「習卜」研究〉，《中國史研究》，第1期(北京，2012.03)，頁5-18；連劭名，〈包山楚簡占卜文書新證〉，《中原文物》，第2期(鄭州，2016.04)，頁60-64轉77。

³⁵ 荊沙鐵路考古隊，〈江陵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第2期(武漢，1988.02)，頁36-43；晏昌貴，〈秦家嘴「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1期(武漢，2005.01)，頁10-13。

³⁶ 趙曉斌，〈荊州棗林鋪楚墓出土卜筮祭禱簡〉，《簡帛》，第19輯(上海，2019.11)，頁21-28。

除了上述，已知還有湖北江陵范家坡 27 號楚墓、武漢江夏丁家咀楚墓卜筮竹簡，在湖南常德和湖北江陵的小型楚墓中也零星發現過這類竹簡。但由於這些簡尚未公開發表，所以暫置不論。³⁷

上述楚簡之外，和禱祠疾病有關的，還有年代屬公元前四世紀的長方形玉片兩件。兩件玉片，學者或稱玉版，或稱玉牘，皆用墨玉製成，其中一件保存完好，一件約自上三分之一處斷折，李零以甲版、乙版別之。甲版長 23.2、寬 4、厚 0.5-0.7 公分，以文字書寫方向看，呈上薄下厚狀，版面留有紅、黑兩種痕跡，兩面皆有銘文。正面刻銘六行書，背面朱書，字迹為一層水垢覆蓋，從露出字迹判斷，似與乙版背面文字相同。乙版形制與甲版略同，兩版或由一板材對剖，一分為二而成。正面六行書，背面接正面，作五行書。研究認為，病主當係秦國宗室成員，即玉版第一人稱作「秦曾孫小子駟」者，有的學者認為即秦惠文王(公元前 356-311 年在位)。銘文載病主以「余身遭病」，準備了「介圭、吉璧」及牛、羊、豕、路車等禮，向「華大山」禱告，希望能使病已、「自復如故」。³⁸

觸及商、周時期醫療相關活動的，還有 2008 年入藏北京清華大學的若

³⁷ 蔡麗利，〈楚卜筮簡綜合研究〉，頁9。

³⁸ 李零，〈秦禱病玉版的研究〉，《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525-548；李學勤，〈秦玉牘索隱〉，《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北京，2000.04)，頁41-45；周鳳五，〈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版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1分(臺北，2001)，頁217-232；曾憲通、楊澤生、肖毅，〈秦駟玉版文字初探〉，《考古與文物》，第1期(西安，2001.01)，頁49-54；李家浩，〈秦玉版銘文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2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04)，頁99-128；連劭名，〈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簡文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期(北京，2001.06)，頁49-57；〈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簡文研究補正〉，《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期(北京，2001.12)，頁52-54；王輝，〈秦曾孫駟告華大山明神文考釋〉，《考古學報》，第2期(北京，2001.04)，頁143-158；劉金華，〈論秦駟玉牘研究四種及其相關問題〉，《漢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0卷第1期(漢中，2002.02)，頁42-48；劉昭瑞，〈秦禱病玉簡、望祭與道教投龍儀〉，《四川文物》，第2期(成都，2005.04)，頁44-47轉69；侯乃峰，〈秦駟禱病玉版銘文集解〉，《文博》，第6期(西安，2005.12)，頁69-75；翁宇翔，〈秦駟玉版「忭、懇、惑、慙」并釋〉，《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6期(曲阜，2007.06)，頁119-120；王美杰，〈秦駟玉版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單曉偉，〈秦駟玉版「靡有(微-彳)休」試解〉，《漢語言文字研究》，第1輯(上海，2015)，頁334-338；顧覺民，〈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版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干戰國竹簡(以下簡稱「清華簡」)。這批竹簡的部分內容因與傳世《尚書》、《逸周書》多所參差，學者又多稱之為「『書』類文獻」。³⁹但它們究竟應被視為殷商、西周當代紀錄的不同傳本，因而可以反映史實？抑或近乎後世所謂「事語」，係「依託」歷史人物，虛構其行誼、言語所形成的教材或談資？⁴⁰學者之間尚不乏歧見。⁴¹在這批形成於公元前四世紀末的「書」類文本中，有整理者題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的簡書一篇。本篇簡共 14 支，三道編，完簡長 45 公分，其中第 8 支簡和第 10 支簡上端均有部分缺失，各

³⁹ 這批竹簡可能是受到盜賣而早於2006年即流落香港市場，其後於2008年7月經收購而入藏北京清華大學。這批竹簡所屬年代，據稱，曾經碳14測定，約當公元前305年前後30年的戰國中晚期，與荊門郭店一號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近似。關於清華簡的來歷，並見李學勤，〈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北京，2009.05)，頁5-6；劉國城，〈李學勤先生與清華簡的入藏〉，《書與畫》，第4期(上海，2019.04)，頁63-66；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文史哲》，第6期(濟南，2010.11)，頁120-125；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史學史研究》，第2期(北京，2011.06)，頁104-109；Sarah Allan, "On Shu 書 (Documents) and the Origin of the Shang Shu 尚書 (Ancient Documents) in Light of Recently Discovered Bamboo Slip Manuscript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5, no.3 (2012): 547-557; *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謝科峰，〈早期古書流傳問題研究——以相關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比較為例〉(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16)；〈「書」類文獻辨析〉，《出土文獻》，第8輯(上海，2016.04)，頁139-145；祿書果，〈清華簡「書」類文獻整理與研究〉(鄭州：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

⁴⁰ 「事語」這種體裁的文本，見於公元前一世紀晚季，劉向等人的《戰國策敘錄》，可能是戰國時期讀書人學習歷史、說話的教材。相關討論可見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第1期(北京，1977.01)，頁36-39。

⁴¹ 利用這批竹簡來校訂商周史事的學者不少，如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第3期(北京，2011.03)，頁70-74；〈由清華簡《金縢》看周初史事〉，《中國經學》，第8輯(南寧，2011.06)，頁1-5；劉國強，〈清華簡與古代文史研究〉，《文史知識》，第3期(北京，2012.03)，頁5-12；路懿菡，〈清華簡與西周若干問題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強晨，〈清華簡與西周開國史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申超，〈清華簡與商周若干史事考釋〉(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許莉莉，〈清華簡所見商末周初史事初探〉(煙臺：煙臺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另一方面，則有學者認為清華簡《金縢》為偽作，如房德鄰，〈清華簡《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是偽作〉，《故宮博物院院刊》，第6期(北京，2013.06)，頁41-51轉157。

約損失三至四字。簡背有次序編號，書於竹節處。第 14 簡簡背有篇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包括合文，全篇約 410 餘字，與傳世本《尚書·金縢》內容大致相合，看來是獨立的一篇文章。⁴²從其中所載武王克殷後重病「不豫」，召公、太公建議「為王穆卜」，周公回應「未可以蹙吾先王」，直指「穆卜」的對象是「先王」；其後，周公又「為三壇同墀」、「秉璧戴珪」，請史為冊，「祝告先王」，稱自己「能事鬼神」，欲以身代武王，使得武王能夠繼續在世，並協助先王「定爾子孫于下地」。⁴³這些卜筮禱祠之舉與傳世《尚書·金縢》相類，主要反映了祖先主宰子孫疾病死生的信仰。⁴⁴

上述的文本內容都與發生疾病時的卜筮禱祠活動有關，大體而言，除了整理者題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的簡書內容比較近乎劉向《戰國策書錄》所提到的「事語」外，不論是殷商、西周甲骨上的疾病卜辭，出自近 10 座楚墓的卜筮禱祠簡，或目前由私人收藏的秦駟禱病玉版，都可以視為身分明確的病人在疾病發生期間留下的卜筮禱祠紀錄。值得一提的是，紀錄中的病人都是身分非比尋常的統治階層成員；進行卜筮禱祠的人不是病人自己，就是近侍的貞人；紀錄的方式，有的是鐫刻龜甲，有的則書之於竹；紀錄的內容則按一定格式書寫；紀錄者多為服侍病人的貞人或其助手。換言

⁴²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原大圖版頁14-17、放大圖版頁73-84、釋文·註釋頁157-162；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審理，《尚書正義》，卷13，〈金縢第八〉，頁392-403；李學勤，〈由清華簡《金縢》看周初史事〉，《中國經學》，第8輯(西寧，2011.06)，頁1-5；杜勇，〈清華簡《金縢》有關歷史問題考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2期(長春，2012.03)，頁61-68；楊振紅，〈從清華簡《金縢》看《尚書》的傳流及周公歷史記載的演變〉，《中國史研究》，第3期(北京，2012.08)，頁47-63；程浩，〈清華簡《金縢》性質與成篇辯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4期(上海，2013.08)，頁88-95。

⁴³ 這裡以整理者之釋文與考釋為底本，並參酌諸家的釋文與考釋，以俗體字表出。見陳民鎮、胡凱集釋，〈清華簡《金縢》集釋〉(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80/SrcShow.asp?Src_ID=1658，2011年9月20日首發，瀏覽日期2020年10月31日)；劉國忠，〈從清華簡《金縢》看傳世本《金縢》的文本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北京，2011.07)，頁40-43；黃湛，〈簡本、傳世本《金縢》校釋——兼論文本流變與詮釋〉，《中國經學》，第25輯(桂林，2019.12)，頁39-52；謝科峰，〈清華簡《金縢》研究三題〉，《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第1期(2019.01)，頁79-84。

⁴⁴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

之，知悉這些身分特別的病人疾病具體情況的，除了病人自身，主要就是其側近之人，相關文本流通的人群範圍應當是有限的，不過，也不能視作絕對封閉的人際圈子。

除了卜筮禱祠文本，前文曾指出，殷人曾透過夢象推占和疾病有關的吉凶。將夢象視為某種預兆，在觸及殷、周之際的歷史傳說中也並不罕見。如清華簡中，有整理者擬題為〈說命〉，分為上、中、下的三篇竹簡。三篇竹簡由同一書手抄寫，簡背有次序編號，每篇篇末簡簡背自題「傳說之命」。上篇有簡7枚，中篇有簡7枚，下篇原有簡10枚，遺失1枚，今存9枚。中篇講述傳說自傅巖來到殷與商王武丁會面，武丁「原比厥夢」，確認傳說是他夢中所見之人，天帝賜給自己的治國幫手；傳說則覆以「允若時」，表達對武丁的同意。武丁又正告傳說：「敬之哉，啟乃心，日沃朕心。若藥，如不瞑眩，越疾罔瘳。朕畜汝，惟乃腹，非乃身」，⁴⁵要他牢記自己的叮囑，扮演好諫諍心腹大臣的角色。這段話也同時反映，在事語撰著者的認知中，夢是天命的展現或未來之事的前兆；藥物引發的不適反應是治癒疾病的必要歷程。⁴⁶而武丁會見傳說的這段內容，與傳世《尚書·說命》上篇、⁴⁷《國語·楚語》白公子張諫楚靈王時所引述的內容相近，⁴⁸只是互有去取、詳略、

⁴⁵ 這裡的釋文除本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並參考李銳、廖名春、王明娟、賈旭東、馬翠等人的斟酌，以俗體字寫出。李學勤，〈試論楚簡中的〈說命〉佚文〉，《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2期(煙台，2008.04)，頁89-90；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說命〉上、中、下，頁29-51原大圖版、頁放大圖版、頁121-131釋文；李銳，〈清華簡〈傳說之命〉研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6期(深圳，2013.11)，頁68-72；廖名春，〈清華簡〈說命中〉的內容與命名〉，《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4期(揚州，2014.07)，頁84-86轉101；王明娟，〈清華簡〈說命〉集釋〉(合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6)，頁56-84；賈旭東，〈清華簡〈傳說之命〉綜合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古漢語文字學碩士論文，2016)，頁28-37；馬翠，〈清華簡〈說命〉集釋〉(保定：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16)。

⁴⁶ 劉國忠，〈清華簡〈傳說之命〉夢境試析〉，《出土文獻》，第6輯(上海，2015.04)，頁176-183；周佳琳，〈清華簡〈傳說之命〉研究〉(濟南：濟南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⁴⁷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尚書正義》，卷10，〈說命上第十二〉，頁292-295。

⁴⁸ 韋昭註，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措詞和具體時地之異。

除此之外，又有整理者擬題為〈程寤〉的文本。「程寤」原目見於傳世《逸周書》，但內容已佚。書載的竹簡9枚，保存良好，但原無篇題和次序編號，整理者遂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見類似文字擬題。⁴⁹故事描述周文王時，

惟王元祀貞月既生魄，大妣夢見商庭惟棘。迺小子發取周廷籽樹于厥間，化為松柏槭柞。寤驚，告王。王弗敢占，詔太子發，俾靈名凶祓，祝祈祓王、巫率祓太妣、宗丁祓太子發。幣告宗祊社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烝占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于皇上帝。⁵⁰

文王之妻大妣在文王元年正月既生魄日夢見商人之廷僅存棘木，又見太子發從周人之廷取了籽樹在商廷中種下，從而化成松、柏、槭、柞。大妣醒後大驚，將夢象告訴文王。文王不敢占夢，召來太子，分別請祝、巫、宗等人員協助為自己、大妣和太子發祓除凶厄。又向宗廟、社稷、六末山川獻禮、祈求，並在向商神致祭後，於望日在明堂占夢。占夢結果顯示，這是要從皇上帝處膺受商命，因此文王乃與太子發一道敬拜此一吉夢。這則故事則反映，文王、大妣等人相信，夢是天命的展現或未來之事的前兆。尚值一提的是，故事的近似內容除前揭類書，亦見於晉人張華的《博物志》。⁵¹

2002)，〈楚語上第十七〉，頁502-505。

⁴⁹ 歐陽詢等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卷89，〈木部下〉，「棘」，頁2299；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84，〈皇王部九〉，「周文王」，頁396引《帝王世紀》；卷533，〈禮儀部十二〉，「明堂」，頁2418。

⁵⁰ 這裡的釋文除本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並參考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頁6-7原大圖版、頁47-51放大圖版、頁131-141釋文；湯淺邦弘，〈太妣の夢と文王の訓戒：清華簡〈程寤〉考〉，收入《竹簡學：中國古代思想の探求》（大阪：大阪大學出版社，2014），頁183-198；夏含夷，〈說籽：清華簡《程寤》篇與最早的中國夢〉，《出土文獻》，第13輯（上海，2018.10），頁84-90。

⁵¹ 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8，〈史補〉，頁93。類似的故事，傳世文本也往往見之，如《禮記·文王世子》中武王對文王說：「夢帝與我九齡」、《尚書·泰誓》武王說「朕夢協朕卜」、《詩·正月》中詩人慨

至於出土文獻中與醫療關係較大的夢占文本，則有以下幾種：

1.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根據現有簡報，2015年初，安徽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入藏一批竹簡。經專家鑒定和竹簡樣品的年代檢測，確認其年代為戰國時期。經初步整理，這批竹簡共有編號 1167 個，保存狀況良好，完簡較多。竹簡形制多樣，長短不一，最短的約 21.3 公分、最長的約 48.5 公分、簡寬 0.4-0.8 公分。長簡編繩三道，短簡則為兩道。殘留物顯示，編繩屬於絲麻類材料，有的染成紅色。簡背含有豐富資訊，不少留有劃痕或墨痕，有的還有編號或一些其他文字。竹簡由不同人抄寫，書體風格多樣，字跡清晰。經初步整理和辨識，這批竹簡中有《詩經》、楚國歷史、孔子語錄等諸子類著作，還有楚辭及相面、占夢等方面作品。有關占夢的竹簡，約 11 支，殘斷過甚，無完簡，應為解夢一類的作品。⁵²至於具體的內容，尚待整理出版。

2. 湖北長沙嶽麓書院藏秦簡。其中有由整理者擬題的《占夢書》。這批秦

歎自己受民之訛言困擾，說道：「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斯干》說貴族家居生活：「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其他像《左傳》、《國語》中述及夢和軍政關係的事例，《周禮》春官「大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等職守，也都反映夢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意義，「占夢」之術在趨吉避凶的行動選擇上的角色。鄭玄注，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20，〈文王世子第八〉，頁727；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尚書正義》，卷11，〈秦誓中第二〉，頁328；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12，〈正月〉，頁832-833；卷11，〈斯干〉，頁805-807；晁福林，〈春秋時期的夢與占夢〉，《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煙台，1995.09），頁8-15；陳筱芳，〈春秋夢兆信仰〉，《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5期（成都，2007.05），頁110-114；王章睿，〈《左傳》夢例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鄭玄注，賈公彥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周禮注疏》，卷24，〈大卜〉，頁746-757；卷25，〈占夢〉，頁767-772；有關古代夢占現象的一般性考察，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夢〉，頁30-37；劉豔，〈先秦兩漢占夢現象的文化考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⁵² 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第9期（北京，2017.09），頁54-59。

簡原分為 8 大捆，於 2007 年 12 月後陸續自香港入藏嶽麓書院。原來應係出於墓葬，抄寫年代約當秦始皇時期(公元前 221-210 年)。整批秦簡約有竹木簡編號 2098 個，整簡約 1300 枚，絕大部分為竹簡，木簡較少，約僅 30 多個編號。其中比較完整的簡的長度大致有三種，即約 30 公分、約 27 公分和約 25 公分的。簡寬 0.5-0.8 公分。編繩分為兩種，一種是三道，即上、中、下各一道編繩；一種是兩道，即在簡的中間繫兩道編繩。簡上多有編繩殘痕，從編繩殘痕狀況我們可以看到這批秦簡的編聯有兩種情況，即一種是先抄寫再編聯，因為一些殘存的編痕將文字的筆劃遮蓋住了；另一種是先編聯再抄寫，因為系聯編繩的位置內完全沒有文字的痕跡，顯得乾淨而齊整。竹簡文字都抄寫於竹黃一面，但在幾枚簡的背面發現有「卅四年質日」、「◆◆年質日」、「律」、「數」等文字，這顯然具有篇名性質。簡的抄寫文字顯示出不同的風格特徵，經初步分析，至少有 8 種以上的不同風格，而這顯然不是某一個抄手所能獨立完成的，因此，這批秦簡應是由多位抄手所抄寫。

至於《占夢書》的出土訊息，截至目前看來，仍不充分。我們不清楚它是獨立成卷或與它書合卷；由於頗多殘斷，原簡的編次也無從查考。因此，相關的討論基本上聚焦在其內容的釋讀與結構的推測上。經整理、綴合約 50 枚簡，目前可以釋讀的，大約有 46 整簡。簡長約 30 公分，有三道編繩。抄寫分兩種形制，一種是不分欄抄寫的，約有 5 枚，內容是關於夢占的理論解釋。這部分顯然有缺損，若干簡之間的文義不太連貫，有的簡則文義顯然未完，但這批簡中已找不到可以比附這種夢占內容的竹簡。另一種是分兩欄抄寫的，由於多有殘損，拼綴和編聯工作相當不易。分兩欄抄寫的內容，似乎也不嚴格，上下欄的文字數量也多不相同，因此其讀法是先橫著讀完上欄之後再讀下欄，還是每支簡從上欄往下欄連讀，還很不好確定。無論如何，目前的編排方式是分成三部分：第一是夢的部分，由 5 枚通欄抄寫的簡組成，排在篇首；第二是夢占的內容，由 35 枚構成，大致按天、地、人的順序，排在篇中；第三是有關祭祀神靈的夢占內容，由 6 枚組成，排在篇尾。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雖然全篇的文字保留了不少秦篆的風格，但仍有不受規範、未定型的特色；同時，從字跡視之，全篇應當是兩位以上書手抄寫的結

果。⁵³

3.湖北雲夢睡虎地 11 號秦墓出土竹簡《日書》中的《病》、《夢》、《詁》、《有疾》諸篇。該墓為小型的一棺一槨墓，下葬於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墓主可能名喜，應當是擔任過安陸令史、鄢令史等主管法律的秦吏。隨葬器物主要放置於頭箱和棺內，頭箱放置漆、竹、銅、陶等類隨葬器物約 70 件。棺內隨葬竹簡，並有毛筆、玉器、漆奩等物。另在墓坑東邊的壁龕與槨蓋板上，也有少量器物。

竹簡總計 1155 枚，殘片 80 片，分為八組，堆放有序，分別置於棺內人骨架的頭部、右側、足部和腹部等處。除少數因積水浮動而散亂與置於足部的竹簡殘斷較多外，絕大部分保存完好。整簡一般長為 23.1-27.8 公分，寬為 0.5-0.8 公分。簡文為墨書秦隸，有的兩面均有墨書文字，大部分只書於篋黃

⁵³ 陳松長，〈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第3期(北京，2009.03)，頁75-88；陳偉，〈嶽麓書院秦簡考校〉，《文物》，第10期(北京，2009.10)，頁85-87；〈讀嶽麓秦簡《占夢書》札記〉，《簡帛》，第9輯(上海，2014.10)，頁157-162；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彩色圖版，占夢書，頁38-44；紅外線圖版，占夢書，頁150-173；釋文連讀本，占夢書釋文，頁192-194；放大本，占夢書，頁67-78；王勇，〈五行與夢占——嶽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的占夢術〉，《史學集刊》，第4期(長春，2010.07)，頁29-33；邱亮，〈嶽麓書院藏秦簡(一)語言文字研究〉(吉首、張家界：吉首大學漢語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陳振華，〈《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字形與書法研究〉(吉首、張家界：吉首大學漢語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馬芳，〈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貳)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3)；王錦成，〈《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文字整理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劉珏，〈《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文字研究與文字編〉(長沙：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3)；臧磊，〈《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校注〉(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陳垠昶，〈嶽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龐壯城，〈嶽麓簡《占夢書》零釋兼論其成書機制〉，《學行堂語言文學論叢》，第4輯(成都，2013.10)，頁60-89；湯淺邦弘，〈岳麓秦簡《占夢書》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國研究集刊》，第57號(大阪，2013.12)，頁100-115；魯家亮，〈嶽麓秦簡《占夢書》零拾〉，《江漢考古》，第3期(武漢，2014.06)，頁119-121；陳松長等著，《嶽麓書院藏秦簡的整理與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4)，頁1-49、89-97、134-162；高一致，〈《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補釋(五則)〉，《江漢考古》，第1期(武漢，2016.01)，頁109-112；孫占宇、魯家亮，〈放馬灘秦簡及岳麓秦簡《夢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翁明鵬，〈嶽麓秦簡《占夢書》抄寫年代考辨〉，《中國文字研究》，第30輯(上海，2019.12)，頁84-93；廉超，〈嶽麓書院藏秦簡《夢書》研究綜述〉，《簡帛研究》，秋冬號(桂林，2020.01)，頁317-323。

上。竹簡殘存的繩痕可以看出，竹簡係以上、中、下三道將竹簡順序編組成冊，是先編好再書寫的。清理時編綴的繩索已朽，順序多已散亂。其中和醫療相關的有《日書》中的《病》、《夢》、《詰》、《有疾》諸篇，可以看到當時的一種知識分類型態。

《日書》甲種(原無篇題)，有 166 枚簡，位於人骨足下，原簡分一至八欄，簡的正、背面都有文字，字寫得小而密，需先讀正面，後讀背面。《日書》乙種(原有篇題)，有 259 枚簡，置於人骨頭右，原簡分一至八欄，只有正面有字，字寫得較大，「日書」標題在最後一支簡的背面。⁵⁴

《日書》甲種中的《病》篇，「病」是原有標題，標題前有圓點標記。《病》篇自第 68 簡寫到第 77 號簡，皆寫在正面第貳欄，簡的上方第壹欄是《星》篇，第貳欄的右方則是《歲》篇，《歲》篇則分四欄書寫。《病》篇的內容和基本格式是依天干順序，次第說明「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及「壬癸」日有疾，何者「為崇」，「得之」於何，「從」何而「來」、何日「病」(病情加重)、何日「有聞」(病情減緩)，何日「酢」(報祭)，若不酢，「煩居」某方，「歲」在某方，則何「色」死。⁵⁵

⁵⁴ 《病》、《夢》、《詰》在《日書》甲種中，《有疾》、《病》、《夢》在《日書》乙種中，《病》、《夢》兩篇可相對照。季勳，〈雲夢睡虎地秦簡概述〉，《文物》，第5期(北京，1976.05)，頁1-6；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第6期(北京，1976.06)，頁1-10；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圖版，《日書》甲種，頁94-95、104-107；《日書》乙種，頁134-135；釋文注釋，《日書》甲種，頁193、210、212-219；《日書》乙種，頁246-247；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收入《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香港：中華書局，1993)，頁405-454；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日書」における病因論と鬼神の關係について〉，《東方學》，第88輯(東京，1994.07)，頁33-53；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嶽麓書社，2000)，頁70-71、121-138；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181-194、321-327、339-445；楊華，〈出土日書與楚地的疾病占卜〉，《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6卷第5期(武漢，2003.09)，頁564-570；朱玲、楊峰，〈睡虎地秦簡《日書》醫療疾病史料淺析〉，《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第13卷第5期(北京，2007)，頁388-389；李蜜，〈睡虎地《日書》《病》、《有疾》篇新研——自中國醫學思想史角度的再考察〉，《北大史學》，第16期(北京，2011.12)，頁1-15轉384。

⁵⁵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日書》甲種，頁94-95；釋文注釋，《日書》甲種，頁193-194；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日書》甲種中的《夢》篇，「夢」是原有標題，寫於編繩上方天頭位置。《夢》篇寫在第 13 號簡背面到 14 號簡背面第壹欄，以下則接寫分六欄書寫的「宇居」。內容是敘述人有「惡夢」時，「釋髮西北面坐」，然後祝禱除止惡夢的方法。⁵⁶

《日書》甲種中的《詰》篇，「詰」是原有標題，寫於編繩上方天頭位置。其下，在上欄編繩下，又有圓點標記，下書「詰咎」。簡分叁欄，自第 24 號簡簡背第壹欄，從右至左書寫，寫完第壹欄後再次第書寫貳、叁欄，至第 59 號簡背第叁欄。內容主要書寫驅除鬼物、變怪、不祥的方法。⁵⁷換言之，在《日書》甲種，《病》、《夢》、《詰》雖非聯綴書寫，但他們各自和其他方術文本合寫。

《日書》乙種的《有疾》篇，寫在 181-187 號簡上，181 號簡簡首有一橫線。「有疾」是原有標題，寫於 183 號簡編繩上方天頭位置。⁵⁸《日書》乙種的《病》篇，寫在 188 號簡第壹欄。⁵⁹《日書》乙種的《夢》篇，寫在 189

119, 376-377; 工藤元男, 〈睡虎地秦簡「日書」における病因論と鬼神の關係について〉, 頁33-53; 吳小強, 《秦簡日書集釋》, 頁70-71; 王子今,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 頁182-184; 楊華, 〈出土日書與楚地的疾病占卜〉, 頁564-570; 李蜜, 〈睡虎地《日書》《病》、《有疾》篇新研——自中國醫學思想史角度的再考察〉, 頁1-15轉384。

⁵⁶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 圖版, 《日書》甲種, 頁104; 釋文注釋, 《日書》甲種, 頁210。

⁵⁷ 這批資料的內容, 和湖北荊州胡家草場12號漢墓出土的《詰咎》雷同。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 圖版, 《日書》甲種, 頁104-107; 釋文注釋, 《日書》甲種, 頁212-219; 劉樂賢, 〈睡虎地秦簡日書《詰咎》研究〉, 《考古學報》, 第4期(北京, 1993.10), 頁435-454; 連劭名, 〈睡虎地秦簡《日書》及《詰》篇補證〉, 《江漢考古》, 第1期(武漢, 2001.03), 頁78-79轉30; 〈雲夢秦簡《詰》篇考述〉, 《考古學報》, 第1期(北京, 2002.01), 頁23-38; 蔣魯敬、李志芳, 〈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M12出土的簡牘〉, 《出土文獻研究》, 第18輯(上海, 2019.12), 頁168-182; 荊州博物館, 〈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墓地M12發掘簡報〉, 《考古》, 第2期(北京, 2020.02), 頁3-20; 李志芳、蔣魯敬, 〈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西漢墓地M12出土簡牘概述〉, 《考古》, 第2期(北京, 2020.02), 頁21-33; 李天虹、華楠、李志芳, 〈胡家草場漢簡《詰咎》篇與睡虎地秦簡《日書·詰》對讀〉, 《文物》, 第8期(北京, 2020.08), 頁53-59。

⁵⁸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 圖版, 《日書》乙種, 頁134; 釋文注釋, 《日書》乙種, 頁246-247。

⁵⁹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 圖版, 《日書》乙種, 頁134; 釋文注釋, 《日書》乙種, 頁247。

號簡到 193 號簡的第壹欄，同時寫滿 194 號整簡，和 195 號簡第壹欄。⁶⁰要之，在《日書》乙種中，與《日書》甲種不同，《有疾》、《病》、《夢》是三篇接續書寫的，字跡也似一人手筆。換言之，就戰國至秦這段時期來看，占夢這類圖書似乎可以如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占夢書》，以獨立篇卷形式單行，也可能是像睡虎地秦墓出土《日書》乙種的形式，是以與《有疾》、《病》聯綴的形式編次的。但無論如何，這些現象都顯示，占夢在《漢書·藝文志》雖列在「數術」略下的「雜占」，但實則在操作上，與「方技」很難截然分割。

除了上述，漢簡中也存在若干占夢文本，不過，截至目前，仍只有少數零簡，內容有限，且不易理解，因此暫置不論。⁶¹

要之，從上述事例看來，和經過國家委任的校書者整理的《漢書·藝文志》所呈現的圖書樣態不同，殷商至戰國時期和疾病有關的卜筮禱祠文書也好、占夢文本也好，除了少數如秦駟玉牘這類個例外，他們的編寫大多成之多手、經歷有時，可以說是在相對開放的人際環境中形成，而不是在封閉、禁秘條件下一氣呵成的產物。它們和其他不同體裁的文本，也或分或合，似乎因讀者之需求而有異，很難說已具一定的分類或定例。

三、戰國晚期至兩漢的方技文本

出土古代方技相關文本，大體集中在戰國晚期至兩漢期間。出土的地域包括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及西北地區。其中，有一類是整理者經常以「病方」或「醫方」之名擬題的。以下，便以戰國至兩漢的相關文本為例，先討論他們的書寫、編次和體裁。

1. 清華簡中的《病方》。在前文曾引述的清華簡中，有學者擬題為《病方》的文本。根據整理者指出，《病方》原抄在擬題為《行稱》的另一文本之後，同在一卷竹書上。該卷竹書每簡長約 32.8 公分，寬約 0.6 公分。竹簡正面地

⁶⁰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日書》乙種，頁134-135；釋文注釋，《日書》乙種，頁247。

⁶¹ 這些和占夢有關的文本，主要出於《額濟納漢簡》。見劉樂賢，〈漢簡中的占夢文獻〉，《文物》，第9期(北京，2017.09)，頁70-73。

腳處有次序編號，已編至「十九」，第十二、十五簡佚失，第十一簡僅剩下部一小半，其餘十六支簡基本完整。第一至十簡載《行稱》，僅剩一小部分的第十一簡，除編號外，未見正文文字，由此推測《行稱》內容不會超過十一支簡。第十簡末句雖已寫至簡尾，但內容已很完整，不排除本篇有就此完結的可能。如果再參考清華簡《四告》全卷的抄寫格式，第十一簡也可能原為一支空白的「隔簡」。這部分簡文以「凡行稱之道，月六稱，歲四合」開宗，其後依次記載了一月之中「六稱」的具體日期、利弊和成效，所記稱行之事均屬布政的內容。先秦時令文獻流傳較多，有以「月」為綱者，如《夏小正》、《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管子·幼官》、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等篇；有以「日」為綱者，如睡虎地、九店、周家臺、放馬灘、孔家坡等簡牘的「日書」。《行稱》兼采「月令」的政令性和「日書」的細緻性，專述一月內政事的宜忌，在先秦時令文獻中尚屬首見。本篇原無題記，篇題則據簡文首句擬定。

第十三、十四簡載《病方》，內容性質與第一至第十簡全然不同，字迹也分屬兩種，故分作兩篇處理。第十六至十九簡首尾完整，除編號外無其他文字，在清華簡中尚屬首見。因第十四簡文末已見截止符，可推知本卷原自第十五簡後均為空白簡，從用途看，其上應還可備抄其他內容。《病方》接寫在《行稱》之後的同一卷竹書上。《病方》篇首已殘，據整卷竹書的編聯情況判斷，本篇最多有三支簡，現存後兩支。簡文殘存三十三字，記病方三種。前兩種屬酒劑，內服，末一種為湯劑，外用，分別針對「肩、背疾」、「執心」和「目疾」，其中「肩、背疾」曾見於楚地出土的卜筮祭禱簡，屬當時常見病類。與過周家臺秦簡《病方》、北大秦簡《醫方雜抄》以及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阜陽漢簡《萬物》、老官山漢簡《六十病方》、北大藏漢代醫簡等相比，本篇所記三種病方的藥物構成較為簡單，所針對的疾病也只略記其病名，但其抄成時代最早。簡文所記藥材多不可識，整理者認為，或許使用的是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中提到的「荊名」。⁶²要之，公元前四

⁶²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本輯說明〉，頁1；原大圖版，頁18-21；放大圖版，頁101-105；〈釋文注釋〉，〈行稱〉，頁149-153；〈病方〉，頁154-155。

世紀末，若干墓葬中的病方，未必以獨立單行形式流通，而可能與其他近乎月日宜忌的數術之書合抄並行。

2.湖北荊門沙市周家臺 30 號秦墓出土竹簡中由整理者擬題的《病方及其它》。周家臺 30 號秦墓中的竹簡出於棺槨間北端西南部的槨底板上，出土時為竹筭編席包裹著，並與其上的淤泥相膠結緊貼於槨底板。竹簡呈東西向放置，簡首向東。竹簡的形制有長簡、短簡之分，長、短簡各自成卷相疊壓，長簡在上，短簡在下。在長簡之中，又觀察到最上層一卷中每枚簡尾末端皆有斜面，呈「削頭」。其下的竹簡，每枚簡尾末端則為無斜面的「平頭」。這表明兩種竹簡存在著取用材料上的不同，推測二者也可能存在著內容篇節上的分別。因此，整理者依其形制差別、分卷疊壓的放置狀態和編聯程序後，將這批竹簡分為上、中、下三個部分清理，依次編為甲、乙、丙三組。

甲組簡均為長簡長 29.3-29.6 公分，寬 0.5-0.7 公分，厚 0.08-0.09 公分，尾端均為「削頭」。從編聯情況推測，應為先編聯成而後書寫文字的。乙組竹簡形制、編聯情況等，均與甲組相同，唯竹簡尾端無斜面，呈「平頭」。丙組竹簡均為短簡，長 21.7-23 公分，寬 0.4-1 公分，厚 0.06-0.15 公分。按竹簡寬度，又有寬簡和窄簡之分，寬簡寬度約在 0.7-1 公分之間，而窄簡寬度約在 0.4-0.6 公分之間。寬簡一般較窄簡後，但製作較為粗糙。寬簡的數量較窄簡多。編聯方法與甲、乙組同，但編聯線下無契口，原編聯排列並不平齊，應是在文字書寫完畢後再編聯成冊的。

甲、乙兩組竹簡製作規格較為一致，簡上竹節均已去掉。而丙組竹簡製作較不齊整，其長短、寬窄、厚薄差異較大，有兩枚竹簡下部還留有竹節。甲、乙兩組竹簡上的文字，書寫工整，用筆嫻熟，書體風格基本一致。丙組竹簡上的文字，其書體則有上下筆劃貫穿之勢。寬、窄兩種竹簡文字大小、書體風格的差異更明顯。寬簡上的文字大而排列稀疏，書體較為隨意，有的字迹不甚清楚。窄簡上的文字小而密集，字迹清晰，結構嚴謹，可以看出丙組竹簡文字並非一人一次寫就。甲、乙兩組竹簡一般將文字寫在上、下兩道編聯線以內，上留天頭、下留地腳。丙組竹簡文字一律頂頭書寫，簡尾也不留地腳。

甲組竹簡簡文的內容為「二十八宿」占、「五時段」占、「戎曆日」占、

「五行」占和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等。乙組竹簡簡文的內容為秦始皇三十四年全年日干支。丙組竹簡簡文的內容為醫藥病方、祝由術、擇吉避凶占卜、農事等。整理者將甲組中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曆譜竹簡抽出編排到乙組，與乙組合編為第一組，擬題為《曆譜》，內含有原小標題《卅六年日》；同時將甲組中所剩「二十八宿」占等內容編為第二組，擬題為《日書》。經拼接編聯，竹簡總數計 381 枚，統一依次編加順序號，其中第一組有竹簡 130 枚，含空白簡 4 枚，第二組有竹簡 178 枚，含空白簡 10 枚，第三組有竹簡 73 枚。⁶³

第三組(丙組)73 枚竹簡(309-381 號)原來是自成一卷放置在最下層，從簡號看來，可以看出竹簡在編聯完畢後，是按逆時針方向收卷的。至於本組竹簡的編聯次序，哪一部分被卷在裡層，哪一部分被卷在外層，因簡文中各句內容可以獨立成段，不易確立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繫，因此也難以恢復原編聯序。⁶⁴有的學者則認為，丙組簡的寬窄不一，文字的大小、間距、書寫風格有別，非一人一次寫成。⁶⁵

表一、湖北荊門沙市周家臺30號秦墓第三(丙)組簡內容

竹簡編號	主治	備註
309-310	「已腸辟(澀)」	
311	「溫病不汗」	
312	「下氣」	
313	「不單(憚)病」	
314	「長髮」	
315-318	「去黑子」	

⁶³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發掘報告〉，頁154-155。

⁶⁴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簡版釋文與考釋〉，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頁126。

⁶⁵ 蔣豔，〈周家臺簡379的編聯及相關未釋字的釋讀〉，《中醫藥文化》，第15卷第4期(上海，2020.08)，頁92-96。

319-320	主治不明	上有缺簡，整理者疑係「去黑子」，謝妍、沈澍農以為當為「乾蘇」
321-322	「恒炊(吹)」	
323	「段(痕)」	
324-325	「治(疒+委)(痿)」	
326-328	「已齶」	
329-330	「已齶」	
331	主治不明	簡首有「●其一曰」，疑亦「已齶」
332-334	「已齶」	
335-337	「病心」	
338-339	「癰」	
340-344	主治不明，疑有缺簡	343-344 為殘簡，未能密接
345-346	「馬心」	
347-353	「先農」	
354	主治不明	簡有「以穀種種」句
355-360	六甲孤虛	
361-362	「亡馬牛」	
363	「有行而急」	
364	文意不明	疑為錯簡，似為受遣出行記事
365-366	文意不明	疑前有缺簡，似與祠明星有關
367	文意不明	當有續簡，與一日時分有關
368-370	「浴蠶」	
371	「鼠」	
372	「已鼠」	
373	「肥牛」	
374	文意不明	視其字形，疑與下簡聯繫

375	不明	
376	「瘡已」	下有缺簡
377	「守室(宮)」、「食丹」	前後有缺簡
378	文意不明	有「塞」、「合藥」、「女子」，疑與前簡聯繫
379	「女杯復產」	前有缺簡。蔣黈認為，當與340-344簡相接，係通過杯子著地後的俯仰情況來預測胎兒性別的方術
380-383	文意不明	簡殘甚

表格來源：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圖版〉，一「周家臺30號秦墓簡牘」，(三)病方及其他(圖版三八-四五)，頁48-55；〈簡版釋文與考釋〉，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三)病方及其他，頁126-137；劉樂賢，〈從周家臺秦簡看古代的「孤虛」術〉，《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2005.11)，頁50-56；龍永芳，〈古代孤虛術小議——兼論周家臺秦簡中的孤虛法〉，《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2卷第2期(荊門，2007.02)，頁85-89；劉金華，〈周家臺秦簡醫方試析〉，《甘肅中醫》，第20卷第6期(蘭州，2007.06)，頁24-26；彭浩，〈讀里耶「祠先農」簡〉，《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上海，2007.11)，頁18-24；黃菊珍，〈舍秦父而擇先農——由《關沮秦漢墓簡牘》看臘、蠟合一〉，《咸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1期(咸陽，2009.01)，頁10-12；王貴元，〈周家台秦墓簡牘釋讀補正〉，《考古》，第2期(北京，2009.02)，頁70-74；宋超，〈先農與神農炎帝——以里耶、周家台秦簡為中心的討論〉，收入霍彥儒主編，《炎帝、姜炎文化與民生》(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頁60-70；史志龍，〈秦「祠先農」簡再探〉，《簡帛》，第5輯(2010)；房相楠，〈小談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它》中的短語〉，《唐山學院學報》，第25卷第4期(唐山，2012.07)，頁52-53；呂亞虎，〈試論秦漢時期的祠先農信仰〉，《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5期(南昌，2013.10)，頁103-111；沈剛，〈秦代祠先農制度及其流變〉，《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上海，2013.12)，頁168-180；方勇、侯娜，〈讀周家臺秦簡「醫方」簡札記(二則)〉，《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3期(煙台，2015.05)，頁52-54；田天著，富嘉吟譯，〈北大秦簡祠祝書初探：兼ねて周家臺「病方簡」の構成に及ぶ〉，《學林》(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漢字文獻の現在」特集)，第62期(京都，2016.03)，頁131-151；李國強，〈周家臺「祠先農」簡的釋、譯與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夏之卷(北京，2016.05)，頁80-100；田旭東，〈秦簡中的「祠五祀」與「祠先農」〉，《西部考古》，第1期(西安，2016.12)，頁217-224；謝妍、沈澍農，〈周家臺「病方」疾病名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4期(南京，2017.12)，頁215-217；張雷，〈周家臺秦簡「馬心」考〉，《中國文字學報》，第8輯(北京，2017.12)，頁144-145；方勇，〈談關沮秦簡所載秦代的浴蠶術〉，《社會科學戰線》，第3期(長春，2018.03)，頁265-269；謝妍、沈澍農，〈周家臺秦簡〈病方〉「乾者」考〉，《中華中醫藥雜誌》，第34卷第1期(北京，2019.01)，頁72-74；蔣豔，〈周家臺簡379的編聯及相關未釋字的釋讀〉，頁92-96；呂亞虎，〈秦簡中的浴蠶術及其相關俗信發微〉，《中國農史》，第5期(南京，2020.10)，頁11-20。

要之，從周家臺秦墓丙組竹簡的形制與內容看來，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前後，病方與祝由、孤虛、先農等術合抄於一卷的情況，與清華簡中《病方》和《行稱》合寫的編次情況類似。⁶⁶

⁶⁶ 有關「祝由」之術的討論，請參林富士，〈「祝由」釋義：以《黃帝內經·素問》為核心文本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4分(臺北，2012)，頁671-738。

3.是尚未完整公佈的北京大學藏秦簡牘中的「醫方」簡。這批秦簡牘於2010年初自香港入藏北京大學，約有竹簡762枚、木簡21枚、木牘6枚、竹牘4枚、木觚1枚，抄寫年代約當秦始皇時期(公元前221-210年)，原來當係出於江漢平原的墓葬，墓主應為秦的地方官吏。整理報告指出，竹簡依其保存狀況，可以分為十卷，其中寫有醫方的第四卷約300餘枚，是篇幅最長的一卷，屬原簡堆積中第四大層中的東組，其下疊壓簡L-005-L-014與竹牘Z-011。第四卷簡長22.6-23.1公分，寬0.5-0.7公分，正、背面均書有文字，其內容依次可以初步分類如下：

表二、北京大學藏秦簡牘第四卷編次表

正背	篇序	文本	簡數
正面(竹黃)	(一)	《算書》(整理者擬題)甲種：	210 餘枚簡
	(二)	日書甲組	50 餘枚簡
	(三)	《制衣》(整理者擬題)	27 枚簡
	(四)	《算書》乙種的開頭	數量不明
背面(竹青)	(一)	接抄正面《算書》(整理者擬題)乙種	與正面《算書》乙種合計近40枚簡
	(二)	「醫方」(整理者擬題)	83枚簡，含前5枚《避兵方》(今人擬題)、15枚空白簡，及63枚《醫方雜抄》(今人擬題)
	(三)	《道里書》(整理者擬題，後改稱《水陸里程簡冊》)	66枚簡
	(四)	《禹九策》(整理者擬題)	51枚簡
	(五)	《袪除》(整理者擬題)	26枚簡
	(六)	日書乙組	31枚簡

第四卷所有竹簡皆存有三道編痕，書寫內容也都分佈在編痕兩側，因此

本卷應為編聯完畢後再行抄寫。其次，本卷大部分竹簡靠近最下端處畫有一道豎直的墨線，與一字的長度相近或略長，但不見於其他卷。這類勾畫符號常見於漢代遺策或其他清單類出土文獻，一般認為是表示核對完成的確認符，但本卷中這一符號的作用尚有待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本卷不同文本的書體不盡一致，至少有三種，應非一次抄成。但同一面抄寫的不同文本在銜接處有前後交錯的現象，正、背兩面篇章的對應也很不整齊，說明本卷不太可能是由幾篇分別抄寫的簡文拼接而成。至於它們是在同一簡冊中由不同抄手陸續抄寫成的，還是經過多次增寫重編，也尚待研究。⁶⁷

晚近根據學者指出，最初簡介稱作「醫方」的簡冊，又可再進一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由 5 枚連續書寫的竹簡組成，共有兩個章題，皆書於上編痕的上方，內容近於「避兵方」；第二部分是 15 枚空白簡；第三部分由 63 枚簡連續書寫，沒有章題，內容與周家臺 30 號秦墓〈病方及其他〉、馬王堆 3 號漢墓《五十二病方》近似，可以稱作「醫方雜抄」。「醫方雜抄」的內容則大體包括治療「癰」一類疾病的醫方、處理如「嬰兒篤虎(唬)」的方術、「去百疾」等祝禱，及「令蠶毋死」或「浴童女」(疑似「浴蠶»)和農事有關的方術。⁶⁸可以這麼理解，「避兵方」接近《漢書·藝文志》列在「兵書」略所謂

⁶⁷ 第四卷的竹簡數量，最初簡介是 318 枚，但經綴合後，目前似總計約 300 枚左右。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室內發掘清理簡報〉，《文物》，第 6 期(北京，2012.06)，頁 32-44；朱鳳瀚、韓巍、陳侃理，〈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第 6 期(北京，2012.06)，頁 65-73；韓巍，〈北大秦簡中的數學文獻〉，《文物》，第 6 期(北京，2012.06)，頁 85-89；〈北大秦簡《算書》土地面積類算題初識〉，《簡帛》，第 8 輯(上海，2013.10)，頁 29-42；〈北大藏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2 卷第 2 期(北京，2015.03)，頁 29-36；陳侃理，〈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第 6 期(北京，2012.06)，頁 90-94 轉 96；王愷、胡東波，〈北京大學藏簡牘編繩的顯微分析〉，《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第 24 卷第 4 期(上海，2012.11)，頁 55-65；田天，〈北大秦簡《祓除》初識〉，《簡帛》，第 8 輯(上海，2013.10)，頁 43-48；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出土文獻》，第 4 輯(上海，2013.12)，頁 177-278；〈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的性質和擬名問題〉，《簡帛》，第 8 輯(上海，2013.12)，頁 17-27；劉麗，〈北大藏秦簡《制衣》簡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2 卷第 2 期(北京，2015.03)，頁 43-48；〈北大藏秦簡《制衣》釋文注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4 卷第 5 期(北京，2017.05)，頁 57-62；李零，〈北大藏秦簡「禹九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4 卷第 5 期(北京，2017.05)，頁 42-52。

⁶⁸ 田天，〈北大藏秦簡「醫方雜抄」初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兵陰陽」這種圖書，其中有《辟兵威勝方》七十篇；⁶⁹「令蠶毋死」或「浴啻女」則接近《漢書·藝文志》列在「數術」略「雜占」這種書，如其中有《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⁷⁰他們和治療疾病，及近乎「祝由」，以祝禱除去疾病的方術是編次在一起的。同時，這部分的簡冊，實際上和《算書》、《日書》、《制衣》、《水陵里程簡策》、《禹九策》、《祓除》這類書也是共寫在一道的。

4.湖南湘西龍山鎮里耶古城遺址出土醫方簡牘。湖南湘西龍山鎮里耶古城遺址在 2002 年 4 月開始發掘後，一號井第八層及第九層除出土年代屬秦王政廿五年(公元前 222 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的大量文書類簡牘外，也包含少數醫方簡牘。現先製表如下，以便討論：

表三、湖南湘西龍山里耶1號井第八層、第九層中的醫方

層—編號	釋文	備註
8-258	<input type="checkbox"/> □□狀□然而出不□□為麥 <input type="checkbox"/> □魯治麥鞠三	
8-298	<input type="checkbox"/> 誨旦先食 <input type="checkbox"/>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237-238
8-837	取董芒群木實十	似為病方，或與 8-1976 相關。
8-876+8-1376+8-1959	·治暴心痛方：令以 <input type="checkbox"/> 屋左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取其 <input type="checkbox"/> □□草蔡長一尺，禹步 三，析傳之病者心上。因以左足 <input type="checkbox"/> 踵其心，男子七踵，女子二七踵。	老官山《六十病方·五十八》

第54卷第5期(北京, 2017.05), 頁52-57。

⁶⁹ 班固撰,《漢書》,卷30,〈藝文志第十〉,頁1760。

⁷⁰ 班固撰,《漢書》,卷30,〈藝文志第十〉,頁1773。

	嘗試。勿禁。	
8-1040+8-1329	復=病三歲上者服，尉(熨)【□□□□□□□】已。病不盈三歲者服，尉(熨)七日，俞(愈)。廿【日□□□□□】食後食次(恣)。	
8-1772+8-792	若有所燥，治。治即用，不臧(藏)。• 以五月盡時艾(刈)取析莫暴(曝)乾，取乾、取實臧(藏)。	
8-1363+1042	• 第(第)一L 人病少氣者惡聞人聲，不能視而善暝，善飮(食)不能飮(食)，臨食而惡臭，以赤雄雞冠，完(丸)	
8-1057+8-1243	九十八，治令金傷毋癱方：取鼯鼠，乾而□石，薪(辛)夷、甘草各與鼯。……內，病已如故。治病毋(月+寺)(時)。壹治藥，足治病。藥已治，裹以繪(繒)臧(藏)。治(朮)，暴(曝)若有所燥，治。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令金傷毋痛方》25-29
8-1221	• 七L 病暴心痛灼(灼)者，治之，析莫實，治，二；枯樞(薑)L 菌 ^一 桂，治，各一。凡三物并和，取三指取(撮)到節二，溫醇酒。	
8-1224	• 五L 一曰啓兩臂陰脈。• 此治□□方。	
8-1230	• 三L 一曰取闌本一斗，□□二□□□□□煮□□□□□□孰出之復入飲盡。……	周家臺病方375 號簡
8-1290+8-1397	以溫酒一桮(杯)和，飲之，到莫(暮)有(又)先食飲，如前數。恒(水+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良(服)藥廿日，雖久病必已。服藥時禁毋食醜肉。	237-238
8-1369+8-1937	病煩心，穿地深二尺，方尺半， <input type="checkbox"/> 水三四斗，潰(沸)，注 <input type="checkbox"/> 水 <input type="checkbox"/> 中視其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一參。	
8-1620+9-1569	癰(應)藥燔末，艾盡，【更】。膏直艾者消盡 <input type="checkbox"/> I 蝟(蕪)，日壹更，尉(熨)熱，舉布適復(腹)下，扁(遍)，病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8-1712+8-1811	<input type="checkbox"/> 病有(爻+右+卩)癰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七月壬辰巳·凡十二日。 中病 <input type="checkbox"/> 得六十 <input type="checkbox"/>	
8-1718	<input type="checkbox"/> 治心腹痛，心腹痛者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鬻】 <input type="checkbox"/>	
8-1766	<input type="checkbox"/> 中，撓飲(飲)。已飲(飲)，如再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食次(恣)，毋禁，毋時。治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8-1918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而以藥 <input type="checkbox"/>	
8-1976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半斗◎之·此治黃 <input type="checkbox"/>	
9-18 正背	卅年十一月丁亥，貳春鄉守朝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鬼薪五人，舂、白粲二人，凡七人。其五人為甄廡取茅賀L府L成L臧L跨 一人病：央芻(第一欄) 一人徒養：骨(第二欄)(正) 田手(背)	
9-244	<input type="checkbox"/> 渴瘴瘴者 <input type="checkbox"/> 執飲少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有膏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9-645	一人病已☑	
9-790	卻之，☐言病已癰	
9-1590	☑☐☐☑ ㄣ藥☐更暴如此☐可廿 日 I ☑盡汁 II /	
9-1630	☐食，必溫令煖，入☐☑I 痛即止。不休，有(又)☐☑II	
9-1633	☑傳藥必先洗之日一洗 = 傳 = 藥 = 六十 I ☑嘗☐II	
9-1954	☑斗，飲之。·此治黃瘡方。☑	
9-2097	·☐析令如髮管三，韋束兩、三尺， 漬以水，已☑ I 淬時没水盡孰☐而以布繳☐取☐ ☑ II	
9-2261	樽或誅智，菌藥名物取之 = 時曰有不	
9-2296	加棗(萑+數)半升入湯酒，石湯令甕 苦漬☐☑ 入湯中 令甕曰以以湯泊鬻黃☑	

表格來源：這批簡牘主要於2002年4月至6月起出，整體遺址的考古發掘則持續至2006年。其中有若干簡記吏民疾病及醫藥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第二章里耶古城遺址〉，「第四節出土遺物」，四、簡牘，頁179-217；湖南考古文物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陳

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方懿林、周祖亮，〈《里耶秦簡(壹)》醫藥資料初探〉，《中醫文獻雜誌》，第6期(上海，2012.12)，頁10-13；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頁445-451；方勇、胡潤怡，〈讀秦醫方簡札記二則〉，《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第34卷第7期(長春，2015.07)，頁89-71；劉建民，〈讀《里耶秦簡(壹)》醫方簡札記〉，《簡帛》，第11輯(上海，2015.11)，頁111-115；張朝陽，〈中國已發現最古醫方：里耶秦簡之醫方簡略考〉，《唐都學刊》，第32卷第5期(西安，2016.09)，頁69-74；周波，〈里耶秦簡醫方校讀〉，《簡帛》，第15輯(上海，2017.11)，頁41-54；湖南考古文物研究所編，《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周波，〈《里耶秦簡(貳)》醫方校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28，2018年5月23日，瀏覽日期2020年10月23日)；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

里耶古井中的這批和醫療有關的簡，性質不盡一致。有些前有序號的醫方簡，不無可能是官方所藏「經方」圖書的局部。⁷¹有些醫方簡的內容，則同時見於湖北荊門沙市周家臺 30 號秦墓、湖南長沙馬王堆 3 號漢墓，或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 3 號漢墓出土的醫方，反映醫方之間可能透過官方頒賜、民間傳抄或買賣的途徑流動。有些則類似前文曾引述過的，漢簡中常見的「病名籍」，書載在官服役的士卒的病情和治法。

兩漢時期的出土醫療相關文本，相較於在此之前的時代，不論在編次、體裁或份量上都有值得特別留意之處。以下，亦略按時序，依不同的出土地討論其發現。

1.湖北江陵張家山 247 號漢墓出土的醫療相關文本。該墓下葬年代約當呂后二年(公元前 186 年)，墓主可能原是低階秦吏，後來降漢。該墓棺槨由頭箱和槨室兩部分組成，隨葬品主要出於頭箱。該墓出土 1200 餘支竹簡，竹簡分別出於兩處，一處位於頭箱內緊貼槨室西部擋板底部，上為淤泥和漆木器所壓，出土時已散亂，並多殘斷；一處位於頭箱內緊靠南壁板的底部，上面壓著陶器、漆器及淤泥。竹簡放在竹筍內，推測原是分卷豎向放置的。共有簡書八種，其中《二年律令》、《奏讞書》、《脈書》、《算數書》、《蓋廬》及《引書》為原有書題，曆譜及遣策則由整理小組擬定。各簡之間用三道綴線相連。出土時，竹簡已散亂，部分殘斷較甚。文字書於竹黃一面，書題記於竹青一面。各簡字數多少不一，多者有 40 餘字，全部竹節共四萬餘字。經

⁷¹ 楊勇，〈流動中的病方：戰國秦漢時期病方的流傳與命名〉，頁112-120。

整理，其中的醫療相關文本有《脈書》和《引書》。

《脈書》有竹簡 66 枚，簡長 34.2-34.6 公分，書題寫於簡背。全書分為兩部分：(一)各種疾病名稱 60 餘種，依從頭至足次第排列；(二)人體中經脈走向及所主病證，這部分內容與湖南長沙馬王堆 3 號漢墓出土，學者擬題為《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和《陰陽脈死候》的內容相同。《引書》有竹簡 112 枚，簡長 30-30.5 公分，書題寫於簡背。全書分為三部分：(一)闡述四季的養生之道；(二)記載導引術式及用導引術式治療疾病的方法；(三)著重說明導引養生的理論。現將《脈書》及《引書》的主要內容列之如下，以便參考：

表四、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方技文本

書名	主要內容	簡數	備註
脈書	病	66 支簡	抄寫時間應當在漢初
	陰陽十一脈經		
	脈法		
	陰陽脈死候		
引書	彭祖之道	113 支簡	包括基本動作說明、導引術式的名稱及功效
	呼吸、肢體運動及按摩等具體鍛鍊方法		
	節氣實陰之道		

表格來源：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第1期，(北京，1985.01)，頁10-15；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第1期(北京，1985.01)，頁1-8；荊州地區博物館、彭浩，〈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大批珍貴竹簡〉，《江漢考古》，第2期(武漢，1985.07)，頁1-3；陳耀鈞、閻頻，〈江陵張家山漢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第12期(北京，1985.12)，頁1124-1129；連劭名，〈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初探〉，《文物》，第7期(北京，1989.07)，頁75-81；〈江陵張家山漢簡《引書》述略〉，《文獻》，第2期(北京，1991.07)，頁256-263；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113-128、169-186；程文文，〈從文獻學角度考張家山漢墓醫書成書時代〉，《中醫藥文化》，第4期(上海，2017.08)，頁15-19。

據上述說明，可知張家山 247 號漢墓所出醫療相關文本有二，一是《脈

書》、一是《引書》，當皆以成卷方式單行。

2.湖南長沙馬王堆 3 號漢墓出土的醫療相關文本。該墓下葬年代約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前後，至於墓主是第二代軹侯利豨或他的兄弟，目前尚有爭議。該墓是一座有封土堆帶斜坡墓道的豎穴土坑大型木槨墓，葬具由槨室、三層套棺及墊木組成。墓中出土的大量隨葬文物，分別藏放其中的東、西、南、北四面槨室中。出土簡帛圖書的，主要是東槨室和西槨室。東槨室主要出土物為漆器，總數達 77 件，包括彰顯墓主身分的 6 個漆鼎及配套的六件漆匕。醫療相關圖書均出土於東槨室的標本東 57 的漆奩，漆奩長 59.8 公分，寬 36.8 公分，高 21.2 公分，為長方型雙層結構，上層置放絲帶和一束絲織品，下層設有五個長短大小不等的方格，其中一個靠邊的狹長格內放置了《導引圖》、《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老子》甲本及卷後四篇古佚書、《春秋事語》、四種醫簡，及兩支竹笛，其餘帛書則呈長方形疊在一起摺入一個最大的長方形格中，帛書下壓一隻青蛙，已成乾屍。還有一個長方格安置有一個牡蠣殼，另兩個長方格空著。醫簡出土時，是作兩捆放在靠邊狹長格的最上層，《十問》、《合陰陽》(皆原無篇題)為一捆，木簡《雜禁方》(皆原無篇題)、竹簡《天下至道談》為一捆，雖然提取過程頗費周章，但保護得當，順序沒有打亂。帛書出土時分置於漆奩下層的兩個格子內，等竹簡被提取後，考古人員發現其下還有有圖、有字的帛書，但在提取竹簡時，因為不知其下尚有帛書，在穿線固定竹簡時，已將《導引圖》、《老子》甲本戳爛，後經北京故宮博物院及湖南博物館相關專家修復、整理、裝裱，醫療相關圖書才大體按揭裱順序初裱和裝裱，並拍成照片。

帛書用墨或朱砂(僅《刑德》丙篇一種用朱砂)分別抄寫在整幅(48-50 公分)或半幅(24 公分)的黃褐色絲帛上，絲帛上分別劃有朱絲或烏絲欄格，每行字數，凡整幅者，一般在 70 字左右，半幅者，一般是 32 字左右。帛書每篇均以從右至左直行書寫，也有隨圖表四方錯列書寫者，每一種帛書的開篇多以墨丁(或稱墨記、墨塊)為標記，每篇的末尾多標明題目和字數，文中的章節則多用墨點或朱點來標示。帛書抄寫時代在戰國末年至漢文帝十二年間，由於抄寫時代不同，抄手的書藝風格各異，所以帛書的字體形態也多不相同，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篆隸、古隸、漢隸三種。帛書的形制雖有整幅、半幅

之分，但都是呈手卷式展開。這類手卷式帛書在漆奩內存放時呈兩種狀態：一種是以木片為軸心卷成一卷，一種則分折合成 16 開大小的長方形疊放在一起，絕大多數帛書是這麼存放的。現將醫療相關圖書列表於下，以便參詳：

表五、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方技文本

圖書材質	圖書內容	相關數據	備註
帛書	五十二病方(原無篇題)	書首有目錄，正文每種疾病都有抬頭的標題，每種疾病題下分別記載各種方劑和療法	合抄在兩張帛上
	足臂十一脈灸經(原無篇題)	接寫於五十二病方之後	
	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原無篇題)	接寫於足臂十一脈灸經之後	
	脈法(原無篇題)	接寫於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之後，內容殘損較嚴重，與張家山《脈書》簡 54-66 相同	
	陰陽脈死候(原無篇題)	接寫於脈法之後	合抄在高約 50 公分，長約 140 公分的整幅帛上。帛的前段約 40 公分，抄寫去穀食氣與陰陽十一脈灸經乙
	去穀食氣(原無篇題)		
	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原無篇題)	接寫於去穀食氣之後，內容大體同於甲本	
	導引圖(原無篇題)	接繪於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之後。繪有 44 個人物圖像，31 圖有題記	

			本；後段長約 100 公分，是導引圖
	養生方(原無篇題)	目錄抄寫於卷首，正文在後。帛書卷首抄有小標題，正文每種方術抬頭處都有與卷首相應的小標題，與五十二病方的體例相合。	單獨抄寫於一卷高約 24 公分的帛上，經過多次折疊，出土時殘損嚴重
	房內記(原無篇題)	該卷帛書上繪有朱絲欄框，字寫在欄內。字體屬於帶有篆書意味的隸書。朱絲欄上端框外常加有標明分段的墨點，但有時用有時不用	兩書合抄於一卷帛上，兩書之間留有很大的空隙
	療射工毒方(原無篇題)		
	胎產書(原無篇題)		該卷帛書呈正方形，上下左右都經過對折。帛書二分之一的上方為圖，二分之一的下方為文字。圖分為左右兩圖，右上方即人字圖(原無篇題)，左上方為中心寫有「南方禹藏」的圖，應與房

			內記中的「禹藏埋胞圖灋」合看
竹簡	十問(原無篇題)	101 枚，簡長 23 公分，寬 0.6 公分，上下兩道編繩。	十問、合陰陽出土時原合捲成一卷
	合陰陽(原無篇題)	32 枚，簡長 23 公分，寬 0.9 公分，每簡書 20 字左右，上下共有兩道編繩	
木簡	雜禁方(原無篇題)	11 枚，簡長 22-23 公分，寬 0.11-0.12 公分，每簡約 13-15 字	雜禁方、天下至道談原合捲成一卷，天下至道談在內，雜禁方在外
竹簡	天下至道談(為原篇題)	56 枚，簡長 29 公分，寬約 0.5 公分，每簡約 31-34 字，簡上下端約 1 公分處和竹簡中腰各用兩道細繩編聯	

表格來源：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1卷田野考古發掘簡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第2章三號漢墓)、〈第3章年代和死者〉，頁26-236、237-240；陳松長，〈馬王堆帛書「空白頁」及相關問題〉，《文物》，第5期(北京，2008.05)，頁75-80；陳紅梅，〈馬王堆醫書抄錄年代研究概況〉，《中醫文獻雜誌》，第6期(上海，2009.12)，頁50-52；廣瀨薰雄，〈馬王堆帛書研究〉，收入《簡帛研究論集》，頁261-327；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伍冊，頁187-308；第陸冊，頁1-102、139-171。

這批醫療相關文本寫手不一的情況反映，文本的書寫不是一時之事，也不可能是在封閉的人際圈內完成。但書手是在什麼環境下工作，尚待進一步研究。以《五十二病方》到《陰陽脈死候》合寫在兩張帛上的圖書內容來看，一方面，他們的部分內容和張家山的《脈書》一致，說明了他們應當是抄寫自同一祖本。之所以如此，可能反映他們或者是同一官方圖書的不同寫本，

或者是透過民間書手轉相傳抄流行寫本的結果；另一方面，《五十二病方》和《足臂脈書》的內容，又顯然與張家山《脈書》言「病」的部分不同，反映了「古書往往分合無定」的現象。⁷²

3.是安徽阜陽雙古堆漢汝陰侯夏侯竈墓出土竹簡《萬物》(原無篇題)。該墓是有墓道的土坑木棺槨墓，下葬年代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由於早年曾經盜掘，器物位置遭擾亂，有的器物因棺槨塌毀砸壓破碎，完整的已不多。殘存的器物都放置在頭箱和邊箱內。東邊箱和頭箱的東部有許多彩繪漆片，是木筭殘片。許多器物原放在木筭內，因木筭破壞而散亂。放置的物品有鐵劍、二十八宿圓盤、六王枳盤、枳盤架、鐵錘、石磨、太乙九宮占盤、漆布奩、木弓、銅鏃鐵桿架箭、銅生肖印、漆纜冠殘片、銅帶鈎、金泡釘、錯金銀銅軸頭、銅環、簡牘。簡牘散亂粘結在木筭殘片上，雖橫豎成條，但不易剝離。簡牘有竹簡、木簡和木牘，大部分非常破碎，但已清理出十幾種古籍，包括：一、未經漢人修訂，避秦始皇諱的《蒼頡篇》(似整理者擬題)541字。二、《詩經》(似整理者擬題)100多枚殘簡，有的還殘存篇題和字數，考察這些簡的書寫風格，也可能不是一人一時寫的。三、有《周易》(似整理者擬題)300多枚殘簡，有今本《易經》中的40多卦，有卦畫、卦辭的9片，有爻辭的60多片，每爻辭之間，用圓點隔斷，較接近漢人所謂數術易。四、《年表》、《大事記》(似整理者擬題)，記周秦以來各國君王在位之年，現存170餘枚殘片。五、《萬物》(原作《雜方》，皆整理者擬題)，殘片計133枚，現存最長者21.6公分，存30餘字，有字多寡不等，每段間用墨點間隔，主要為兼具神僊家、「本草」與「博物志」色彩，和《山海經》、《淮南萬畢術》這類古籍有點類似，但又不全同的一類藥物文本。六、《作務員程》(似整理者擬題)，近100枚，說明營造建築的人力及工作日數。七、《行氣》(似整理者擬題)，少量殘簡。八、《相狗經》(似整理者擬題)，殘存數條。九、辭賦。十、《刑德》、《日書》、《干支表》(似皆整理者擬題)。十一、木牘，3塊，1塊較完整，2塊已殘，皆書籍篇題。完整的一塊正、背面各分3行書寫，今存篇題46條，內容多與孔子及其門人有關；另一塊亦兩面書寫，現存篇題20多條，似春秋、戰國故事；還有一塊木牘，書簡短篇題如「樂論」、「智(知)遇」等。

⁷² 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頁29-30。

依整理者的意見，《萬物》的內容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醫藥衛生方面的內容，一類是物理、物性的內容。醫藥衛生方面的內容，包括：(一)玉石、草、木、獸、禽、蟲魚、果、米穀及菜等 70 餘種藥物的治療和保健效用。(二)各種藥物治療的疾病 30 餘種。(三)各種疾病的成因。(四)與神僊家相關的，如「輕體」、「疾行」等道術。在物理、物性方面的內容，包括：(一)某物致某用。(二)物理或自然現象。(三)動植物養殖與捕獲。不過，從現有的出土訊息來看，我們很難確認這類文本是單行或與其他文本合卷了。⁷³

4.湖北荊州胡家草場 12 號漢墓出土簡牘。該墓應為漢文帝時期的墓葬，下葬年代不早於文帝後元元年(公元前 163 年)。墓主生前的身分可能相當於五大夫，推測可能是「史」一級的官吏。M12 墓口被 M1 打破，並被現代房基疊壓，墓坑曾遭盜擾，兩個盜洞分別位於墓坑南北兩端。簡牘出土於墓中棺槨的頭箱內，主要置於頭箱內的竹筭中。竹筭有 2 件，一件保存稍好，另一件保存較差，出土時均裝有隨葬器物。竹筭 M12:10，長方盒形，由蓋和盒身套合而成，壁面用寬 0.3-0.5 公分的篾片呈「人」字形編織而成，周邊用寬 2.6 公分的竹片包夾後以篾片纏縛固定。長 48、寬 28，殘高 6 公分。出土時器內裝滿竹簡、木簡、木牘。竹筭 M12:90，長方盒形，由蓋和盒身套合而成，壁面用寬 0.2-0.5 公分的篾片呈「人」字形編織而成，周邊用寬 2.4-2.8

⁷³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第8期(北京，1978.08)，頁12-30；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第2期(北京，1983.02)，頁21-23；〈阜陽漢簡《詩經》〉，《文物》，第8期(北京，1984.08)，頁1-12；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簡論〉，《文物》，第8期(北京，1984.08)，頁13-21；《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第4期(北京，1988.04)，頁36-47轉54；胡平生、韓自強，〈《萬物》略說〉，《文物》，第4期(北京，1988.04)，頁48-54；尚志鈞，〈從醫藥角度探討《萬物》與《山海經》的時代關係〉，《中醫臨床與保健》，第1卷第3期(合肥，1989.10)，頁47-50；萬方、鍾贛生，〈《萬物》與《五十二病方》有關藥物內容的比較〉，《中國醫藥學報》，第5卷第2期(北京，1990.04)，頁55-58；陳力，〈對阜陽漢簡《萬物》所載藥物與疾病的整理〉，《湖南中醫學院學報》第2期(長沙，1991.02)，頁53-55；董源，〈《萬物》中部分植物名稱古今考〉，《中國科技史料》，第16卷第4期(北京，1995)，頁77-83；朱玲，〈《萬物》與《五十二病方》的藥物學比較〉，《中醫藥學報》，第35卷第5期(哈爾濱，2007.10)，頁49-50；劉金華，〈讀阜陽漢簡《萬物》綴合三題〉，《華中國學》，第7卷(武漢，2016)，頁41-45。

公分的竹片包夾後以篾片纏縛固定。長 58、寬 44.8、殘高 7.8 公分。出土時器內盛放竹簡、石硯、研墨石、銅削刀柄、小米、花椒及各類植物果核。除了一部分因竹筩破損散落出來，大部分簡牘出土時裝在竹筩內，基本保持了入葬時的原貌。由於槨室內積滿泥漿，現場清理工作較困難，竹筩和散落出來的簡牘被整體打包，取回室內進行清理。揭取時，根據簡牘出土時的位置關係將簡牘分為 4 組，其中第 1-3 組出土於竹筩 M12:10，第 4 組出土於竹筩 M12:90，4 組簡牘統一連續編號，剖面圖則在各組內分別用電腦繪製，竹簡和木簡編號為簡 1-4636(含殘損簡)，木簡單獨編號為牘 1-6，共 4642 枚。經過進行紅外線掃描和內容釋讀，這批簡牘初步分為歲紀、曆、日至、法律文獻、醫方及雜方、日書、簿籍、遺冊等幾類，每一類分為數量不等的卷，有的有卷題，有的有篇題和目錄。曆和日至類分別有卷題，法律文獻類有卷題、篇題、目錄，日書類有卷題，醫方及雜方類有目錄。各類簡牘的尺寸以及書寫手法也不盡相同。

出土簡牘中包含病方、祝由、辟兵等內容，約 450 枚簡。簡長 27-30 公分、寬約 0.6 公分，三道編繩。相關的簡字體在所有簡文中最草率。有目錄和篇題，目錄簡有兩套，第一套目錄由 10 支簡組成，按順序記錄 45 個名稱，每簡分欄書寫，前 5 支簡自上而下分 5 欄書寫，後 5 支簡每簡分 4 欄書寫，目錄書寫順序為橫向書寫。第二套目錄簡由 6 支簡組成，共有 30 個名稱，每簡自上而下分 5 欄書寫，目錄書寫順序亦是橫向書寫。篇題簡有圓形墨點，圓形墨點上有數字，數字和墨點都位於簡首的第一道編繩上方。⁷⁴病方、祝由、辟兵合寫一處，與前述北京大學藏秦簡牘類似。

5.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 3 號漢墓出土醫簡。該墓下葬年代，約當漢景帝(公

⁷⁴ 蔣魯敬、李志芳，〈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M12出土的簡牘〉，《出土文獻研究》，第18輯(上海，2019.12)，頁168-182；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墓地M12發掘簡報〉，《考古》，第2期(北京，2020.02)，頁3-20；紀婷婷、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醫方雜識〉，《江漢考古》，第1期(武漢，2020.01)，頁118-123；李志芳、蔣魯敬，〈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西漢墓地M12出土簡牘概述〉，《考古》，第2期(北京，2020.02)，頁21-33；李天虹、華楠、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詒咎》篇與睡虎地秦簡《日書·詒》對讀〉，《文物》，第8期(北京，2020.08)，頁53-59；紀婷婷、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1039號簡所記辟兵術考〉，《文物》，第8期(北京，2020.08)，頁65-69。

元前 188-141 年)至武帝(公元前 156-87 年)間，墓主應是具有較高身份及社會地位的人。該墓曾遭盜，但醫方簡牘主要出於該墓未經盜擾的北二底箱。醫簡出土原始位置及各部竹簡尺寸，可以分為七部分：

(1)簡一部分共 58 支簡，其中 31 支上段完好，下段不同程度殘缺，其餘為上下端皆殘的殘簡。此部分簡最長者為 25.1 公分。上下兩道編繩，通過將所有殘存有兩道編繩的簡與簡二部分完整簡比對，可推算其簡長當與簡二部分竹簡相同，簡長約 27.8、寬 0.84 公分。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脈書·上經》。

(2)簡二部分共 75 支簡，其中 31 支完整，簡長 27.8、寬 0.85 公分，兩道編繩，無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脈書·上經》。

(3)簡三部分共 208 支簡，其中 161 支完整，簡長 34.3、簡寬 0.8 公分，三道編繩，無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治六十病和齊湯法》。

(4)簡四部分共 20 支簡，其中 10 支完整，簡長 22.7、簡寬 0.8 公分，兩道編繩，無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尺簡》，主要是法律簡，和醫學關係不大。

(5)簡五部分共 258 支簡，其中 194 支完整，簡長 35.8、簡寬 0.77 公分，兩道編繩，無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脈書·下經》。

(6)簡六部分共 48 支簡，其中 25 支完整，簡長 30.2、簡寬 0.8 公分，三道編繩，右側有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刺數》。

(7)簡七部分共 63 支簡，其中 53 支上段完好，下段不同程度殘缺，其餘為上下端皆殘的殘簡。此部分簡最長者為 26.5 公分。兩道編繩，編繩位置將簡均分為三段，每段約 10 公分，根據殘存的編繩判斷，簡長約 30、寬 0.77 公分。原題為《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

從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 3 號漢墓出土醫簡的字形及書寫風格看來，古人在傳寫竹簡時，會將內容較多，體量較大的書分成若干部分，分別由不同的書寫者繕寫。⁷⁵

⁷⁵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第 7 期(北京，2014.07)，頁 59-7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 12 輯(成都，2016.03)，頁 215-246；梁繁榮等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

另外，在該墓南二室也出土了體長 14.0、頭寬 2.6、肩寬 4.2、足寬 2.5、厚 2.6 公分的一只人體經穴髹漆木人像，與下葬年代約在漢武帝年間的四川綿陽雙包山 2 號漢墓出土漆木人形近似。⁷⁶

6. 北京大學收藏的西漢醫藥簡。2009 年初，北京大學接受捐贈，獲得了一批從海外回歸的西漢竹簡。同年 3 月，北京大學即成立小組，開始清理、拍照等保護作業。5 月又依照片，就竹簡的形制、字體進行了分類分篇，委請專家釋讀、研究和整理。2011 年左右，初步完成竹簡編聯和釋讀工作。這批竹簡入藏北京大學時，按長度散置於 9 個大小不等的塑膠容器內，浸泡在乙二醛溶液中，並混雜有少量紅、黑色漆器殘片和竹制算籌。竹簡各卷的相對位置及編連次序已完全打亂，因此只能根據起取、拍照順序給予編號。經整理清點，共編號 3346 個。其中完整簡約 1600 枚，殘斷簡 1700 餘枚，估計原有整簡數 2300 枚以上。竹簡表面一般呈黃褐色或暗褐色，質地硬實，字跡清晰，墨色厚重。部分竹簡上用朱砂寫畫的紅色欄格、圖表和文字，顏色仍鮮豔如新。竹簡簡端均修治平齊，多數刻有契口，並保存有編繩痕跡，個別竹簡上還黏附有小段編繩或片狀絲織品。竹簡文字大多書寫於竹黃面，少量竹簡背面上端被刮去一段竹青，在其上書寫有篇題。竹簡保存狀況極佳，加之文字抄寫工整，書法精美，在出土簡牘中實屬罕見。全部竹簡按長度大致可分為三種規格。長簡約長 46 公分，相當於漢尺二尺，三道編繩。中簡長約 29.5-32.5 公分，約相當於漢尺一尺三寸至一尺四寸，三道編繩，不同內容的篇卷之簡長與契口位置均有差異。短簡長約 23 公分，相當於漢尺一尺，兩道編繩，無契口。所有短簡均為醫藥書。

據整理者指出，這批竹簡的抄寫年代，似可從以下幾點情況作一推測。

(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文物》，第12期(北京，2017.12)，頁48-57；柳長華等，〈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的命名與學術源流考〉，《文物》，第12期(北京，2017.12)，頁58-69。

⁷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綿陽博物館編，《綿陽雙包山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肆〈二號墓葬〉，頁125-126；梁繁榮等，〈成都老官山出土經穴髹漆人像初探〉，《中國針灸》，第35卷第1期(北京，2015.01)，頁91-93；黃龍祥，〈老官山出土西漢針灸木人考〉，《中國針灸》，第47卷第3期(北京，2017.05)，頁131-144。

此批竹書中未發現漢武帝以後的年號，僅在一枚數術簡上發現有「孝景元年」紀年。各篇竹書文字的書法與書體特徵不盡相同，抄寫年代可能略有早晚，但大體上可以認為已近於成熟的漢隸，與張家山漢簡、馬王堆帛書中近于秦隸的西漢早期隸書有較明顯的區別，與銀雀山漢簡書體相比亦顯稍晚。但若取其中最接近成熟漢隸的書體與定州八角廊漢墓出土的宣帝時期竹簡書體相比，仍略顯古樸。再結合對竹書內容的分析，推測這批竹簡的抄寫年代多數當在漢武帝時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亦應不晚於宣帝(公元前 91-48 年)。整理者亦推斷，這批竹書的原主人應與阜陽雙古堆漢簡、定州八角廊漢簡的原主人同屬於王侯一級。此外，此批竹簡全部屬於古代書籍，不見簿籍、律令等官府文書檔案，也不見遺策、書信等私人文書，因此可稱之為「西漢竹書」。竹書的內容極為豐富，含有近 20 種古代文獻，基本涵蓋了《漢書·藝文志》所劃分的「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大門類。

北大所藏西漢醫藥簡共 711 枚，其中整簡 516 枚，殘簡 185 枚。整簡長 23-23.2 公分，寬 0.7-0.9 公分，有些簡可辨上下契口及編痕；殘簡長短不一，最短的僅 1.9 公分。這批醫簡沒有書名，根據簡文內容可以分為「醫方目錄」、「醫方甲」、「醫方乙」和「醫經」四類。「醫方甲」是「醫方目錄」的本文，「醫方目錄」和部分「醫方甲」簡還有編號。「醫經」僅 10 餘枚，內容多為病候和藥性的敘述。「醫方目錄」簡 47 枚，其中整簡 28 枚，殘簡 19 枚。從整簡看，醫方目錄分上下四欄書寫，除末簡外，與睡虎地秦簡《編年記》類似，都是每欄文字由右向左讀完再讀下一欄。「醫方甲」有 630 多枚簡，有至少 187 個方名編號，其中並可找到 161 個方名。「醫方乙」只有 7 枚簡，書寫格式與「醫方甲」不同，此類簡先寫醫方內容，然後在簡的下端加一圓點，再寫醫方名稱。醫方名是以人名命名，如「秦氏方」、「冷遊方」、「翁壹方」等方題，跟武威醫簡「公孫君方」等形式相同。整理者亦推測，北大醫簡可能是由當時流傳的名醫驗方摘編而成。⁷⁷不過，截至目前，相關簡未公

⁷⁷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第6期(北京，2011.06)，頁49-56；李家浩、楊澤生，〈北京大學藏漢代醫簡簡介〉，《文物》，第6期(北京，2011.06)，頁88-89。

佈，還很難進一步判斷。

8.江西南昌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鄩墩山海昏侯(公元前 92-59 年)墓出土方技書。該墓主槨室文書檔案庫發現 5200 餘枚簡牘(包含殘斷簡牘)，另在主槨室各處發現 110 枚簽牌(以下簡稱海昏簡牘)。簡牘原放置在四個漆筭中，漆筭大部分已腐朽，底部以織物承托，出土時仍可見部分織物與竹編織物的殘片。竹簡放置在三個漆筭內，最小的存簡一組，200 餘枚，最大的存簡三組，4000 餘枚，其餘 1000 餘枚放置於另一漆筭中。竹簡各卷之間雜有部分木牘。公文奏牘被單獨放在一個漆筭內。簡牘出土時保存情況較差。據目前統計，存字完整的簡牘不足什一。經初步判斷，竹簡基本屬於古代書籍，另有 500 餘枚竹簡與昌邑王國、海昏侯國的行政事務和禮儀等有關。木牘 60 餘件，內容除書籍外，另有公文書。海昏簡牘中的方技書，大致有「房中」、「養生」、「醫方」等，現存竹簡約 200 枚。「房中」在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中記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虛」、「實」而成為「十道」。「養生」借「容成氏」之口講「貴人居處安樂飲食」，並可見「●黃帝一」的章題。「醫方」可見部分方名，其中有與祛除蟲蟲有關的方法。⁷⁸但截至目前，具體內容仍未公佈，相關文本的書寫、編次和體裁尚待進一步研究。

9.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醫簡。該墓結構屬土洞單室，墓門前有斜坡墓道。墓室內東西向置一柏木棺，棺內仰臥一男尸，僅存骨架，有木質鳩杖一件豎立於棺前，杖已殘損，殘長 1 公尺。男尸頭頂有麻質囊袋一個，內包木質簡牘一束，由於屍體腐爛，致部分簡朽蝕殘斷或簡文漫漶，經整理，現存簡牘 92 枚，內容全是醫學相關記載。比較該墓與它墓的墓室、棺木形制，及隨葬器物的類型，該墓下葬年代應為東漢早期，大約在光武(25-57)或稍後的明(58-75)、章帝(76-88)時期。

該墓出土的簡現存 78 枚，其中整簡約 60 枚，少數殘損嚴重。質地為松木或楊木，一般長 23-23.4 公分，每簡墨書一行，背面無字，亦無編號。根

⁷⁸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市新建區博物館，〈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第7期(北京，2016.07)，頁45-62；廉莊，〈海昏侯墓中的醫藥發現〉，《家庭中醫藥》，第4期(北京，2016.04)，頁11-1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文物》，第11期(北京，2018.11)，頁87-96。

據簡的寬窄和編聯方式，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簡寬 1 公分，現存 41 枚，整簡約 30 餘枚，每簡容約 35 字。簡的上、中、下編聯處右側，有刀削製的契口，以容編繩。這類簡中有兩枚空白簡，似類簡冊的扉頁、封面。可能因卷收在外，整體保存狀況較差。第二類簡寬約 0.5 公分，現存 36 枚，每簡容約 37 字。除 2 枚在編聯處有三角形契口外，其餘 34 枚均無缺口，上、中、下三有明顯的編編痕迹。可能因卷收在內，保存狀況較好。這類簡中有一簡題有「右治百病方」數字，應是這批簡冊的尾題。這兩類簡在編聯處均未書文字，上、中、下三端均留有空格，應屬先編後寫的三編簡冊。又出土的寬簡和窄簡的編聯各成一條直線，彼此間距不等，因此，這兩類簡應是兩卷簡冊，但從簡文內容看，寬簡有首簡，窄簡有尾題，又似乎為一篇。

牘版現存 14 片，寬度由 1.1-4 公分左右不等，長度為 22.7-23.9 公分，合漢尺一尺左右，故可稱為尺牘。牘版均無編連痕跡，多為兩面書寫，一面書寫的僅有二枚。書寫行數，除一枚為單行書寫外，其餘多為兩行以上，最多至六行。每行一般容字 33 字左右，個別牘版每行有容字到 40 多字的。牘的內容通常是一牘抄寫一方，與湖南張家界古人堤東漢病方牘類似(詳下文)。

這批簡牘內容均為有關醫學的記載。大多在簡首標列醫方名稱，其下連書藥味、藥量、治藥和用藥方法、針灸穴位、針刺深度和留針時刻，以及針灸和服藥等禁忌，亦有對疾病理療方法的論述，其中現存較完整的醫方有三十多個。現列表如下，以備討論：

表六、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醫方簡

簡牘類型	內容	簡號	
第一類簡寬簡	治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卅歲以上方	3-5	
	治傷寒遂(逐)風方	6-7	
	治鴈聲□□竊言	8-9	

	方		
	治諸	9-10	
	□□療方	11-12	
	治金創止痛，令創中溫方	13	
	皆治合…… 治金創腸出方 治金創內座創養不痛腹張方	14-15	
	治目痛方	16	
	治百病膏藥方	17-18	
	懣儉出箴 ●寒氣在胃脘…… ●黃帝治病神魂忌	19-25	與鍼刺之忌有關
	殘簡	26-41	
第二類簡窄簡	●治魯氏青行解解方	42-43	
	●治心腹大積上下行如蟲狀大痛方 ●從	44-45	
	●治伏梁裏膿在胃腸之外方	46-47	
	去中令病後不復發閉塞方	48-49	
	●金創內漏血不出方	50-51	

	治金創止痛方	52-53	
	●治金腸出方	54	
	●治□□□□□ □潰醫不能治禁 方	55-56	
	治千金膏藥方	57-67	
	不明方	68-71	
	殘簡	72-77	
	●右治百病方	78	
木牘	治欠咳上氣喉中 如百蟲鳴狀卅以 上方	79	
	●治久咳逆上氣 湯方	80 甲-乙	
	治痺手足癱腫方	81	
	●治久泄腸辟臥 血□□裏醫不能 治皆射去方	82 甲-乙	
	燔石…… ●厚朴……公孫 君方	83 甲-乙	
	白水侯所奏治男 子有七疾方	84 甲	
	建威耿將軍方	84 乙	
	☐分，人髮…… (以上殘) ●治東海白水侯 所奏方	85 甲-乙	
	☐【惡病】大風方	86 甲	

	☐熱☐上……(殘牘)	86 乙	
	治加及久創及馬 (安+月)方 治人卒癱方 ●治狗嚙人方 治湯火凍方	87 甲-乙	
	治婦人膏藥方	88 甲-乙	甲、乙各有一方
	百病膏藥方	89 甲-乙	
	五辛不可始久刺……	90 甲-乙	應為鍼灸之忌
	牛膝半斤直五十……	91 甲-乙	應為藥值

表格來源：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旱灘坡漢墓發掘簡報——出土大批醫藥簡牘〉，《文物》，第12期(北京，1973.12)，頁18-21；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武威漢代醫藥簡牘在醫學史上的重要意義〉，《文物》，第12期(北京，1973.12)，頁23-29；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張延昌主編，《武威漢代醫簡注解》(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

10.湖南張家界古人堤房基遺址出土醫方木牘。古人堤房基遺址出土簡牘90枚，其中有編號1與3的醫方木牘兩塊。整理者依其他出土簡牘推斷，應為東漢和帝永元元年(89)到安帝永初四年(110)間，東漢中前期的遺物。出土時，都以廢棄物的形式隨意拋於水塘中而沉入淤泥。編號1木牘長23公分，寬3公分，正面右上方有約6公分的裂縫，但沒有木質缺損，不見有編聯痕迹，正面第一欄書大字「治赤散方」，當係方名標題，餘二至六欄計五欄，分列15味藥，背面書「●凡十六物當熬之令變色」，下半段又有墨迹，依稀可辨「……☐☐相君志之☐」及「……☐賢☐☐☐☐」字樣，當是利用舊牘削去文字再寫醫方。學者由其中藥物推測當係治療外感風寒、邪毒傷風之方。編號3木牘較殘，正面似分三欄書寫，僅付子、白苓等藥可識，背面則

無字，可能亦為主治血虛、腹痛、脅痛、痢疾等方。⁷⁹這類出於房基遺址，被視為廢棄物的木牘，可以反映當時若干醫方可能依病分類，以便於皮藏或攜帶的形式單行於世。

11.湖南長沙市尚德街東漢醫藥簡。湖南長沙市尚德街長沙國際金融中心古井群，在發掘編號為 2011 C S C J 359、J 436、J437、J446、J 453、J 465、J 531、J482、J 575 等九口古井時，共清理出土簡牘 257 枚，有字簡及有墨迹簡牘 171 枚，無字簡 86 枚。仔細清理時發現，有些簡牘外側有碎麻布殘片出土，可能是包裹簡牘所用，但麻布保存狀況不佳，大多殘碎不堪。清理 J575 時，在發掘至距井口深 2.89 米時，出土一件硬陶雙沿罐，在罐內發現一個麻布包裹，打開後才發現，麻布內包裹的是三枚形制相類的木片，其中有兩枚削製成人形，上端還繪有雙眼，眼部以下為墨字，與 2004 年東牌樓東漢簡牘中人形簡為同一性質，可能為具有道教性質之物。尚德街 J482 使用年代約當東漢中晚期靈帝之前，廢棄年代在東漢靈帝(156-189)時期到東吳(229-280)的前期。所出藥方書寫在木牘上，正面存文三行，背面無字。木牘已殘損，長 25.2 公分，寬 4 公分，厚 0.6 公分，上書：「治百病通，明丸方，用甘草八分，弓窮四分，當歸三分，方，乾地黃三分，黃芩三分，桂二分，前胡三分，五未二分，乾薑四分，玄參三分，伏令二分。凡十八物，皆冶，合和丸以白蜜。」⁸⁰

⁷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與出土簡牘概述〉，《中國歷史文物》，第2期(北京，2003.04)，頁66-71；〈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中國歷史文物》，第2期(北京，2003.04)，頁72-84；丁媛、張如青，〈張家界古人堤出土醫方木牘「治赤穀方」考釋〉，《中華醫史雜誌》，第41卷第4期(北京，2011.07)，頁240-242；張雷，〈赤穀方考〉，《甘肅中醫藥大學學報》，第33卷第3期(蘭州，2016.06)，頁114-116；張春龍，〈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簡牘學研究》，第6輯(蘭州，2016.06)，頁1-7；周琦，〈張家界古人堤醫方木牘「治赤散方」新證〉，《出土文獻研究》，第16輯(上海，2017.09)，頁297-304；張春龍、楊先雲，〈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續(上)〉，《簡牘學研究》，第7輯(蘭州，2018.09)，頁146-157；王興伊，〈張家界古人堤出土木牘「治赤穀方」源自西域烏孫考〉，《圖書館雜誌》，第10期(上海，2018.10)，頁110-115。

⁸⁰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長沙：嶽麓書社，2016)，上編〈長沙尚德街出土簡牘古井發掘報告〉，第5章，〈簡牘〉、第6章，〈結語〉，頁76-85；下編，〈長沙尚德街出土東漢簡牘及釋文〉，頁236-237。

12.漢居延地區醫藥簡。秦漢時期，在今天中國甘肅、內蒙一帶，曾是邊塞要地。廿世紀初起，即陸續有不少兩漢時期的簡牘出土。1907 年和 1916 年，敦煌附近先後兩度發現幾百枚漢簡。1930 年代中國和瑞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查團也在今額濟納河兩岸、黑城南，發現 1 萬餘枚簡牘。1973—1974 年間，由甘肅省博物館等單位組成的居延考古隊，又在甲渠侯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隊和肩水金關等地新發掘了簡牘近 2 萬枚。其中除關乎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的官文書，亦不乏醫療相關文本。其時代則跨越漢武帝至東漢初，約當公元前一世紀初前後到公元一世紀前後。⁸¹整體而言，相關文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官文書，一類屬醫藥方。官文書即簡牘所稱「病書」、「病卒名籍」、「病爰書」、「病死爰書」、「病死衣物名籍」之類的記載，如：

第廿四隧卒高自當以四月七日病頭痛四節不舉 鉞庭隧卒周良四月三日病苦□

第二隧卒江潭以四月六日苦心服丈滿

第卅一隊(當為隧)卒王章以四月一日病苦傷寒 第一隧卒孟慶以四月五日病苦傷寒(《合校》4·4A,《甲編》19A)

第卅七隧卒蘇賞三月旦病兩肱筋急少愈

第卅三隧卒公孫譚三月廿日病兩肱筋急未愈

第卅一隊卒尚武，四月八日病頭痛寒暄，飲食五齊，未愈(《合校》4·

⁸¹ 羅福頤，〈祖國最古老的醫方〉，《文物參考資料》，第9期(北京，1956.09)，頁31；耿鑑庭，〈漢簡裡的醫藥疾病資料〉，《江西中醫藥》，第4期(1957.04)，頁59-62；趙友琴，〈流沙墜簡中敦煌醫方簡初探〉，《上海中醫藥雜誌》，第11期(上海，1986.11)，頁48-49；黃騰輝，〈兩張漢簡醫方的啟示〉，《上海中醫藥雜誌》，第4期(上海，1988.04)，頁35；范新俊，〈敦煌漢簡醫方用藥小議〉，《上海中醫藥雜誌》，第9期(上海，1990.09)，頁39；趙宇明、劉海波、劉掌印，〈《居延漢簡甲乙編》中醫藥史料〉，《中華醫史雜誌》，第24卷第3期(北京，1994.07)，頁163-166；李戎，〈居延漢簡醫、藥、傷、病簡文整理研究報告〉，《醫古文知識》，第4期(上海，2001.11)，頁15-18；孫其斌、蘇建兵，〈《居延新簡》中的醫藥簡〉，《甘肅中醫》，第15卷第4期(蘭州，2002.08)，頁17-19；裘錫圭，〈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名稱和醫藥情況〉，《中醫藥文化》，第6期(上海，2008.12)，頁16-19；周祖亮、方懿林，〈居延新簡所記醫藥信息述略〉，《中醫文獻雜誌》，第2期(上海，2011.04)，頁1-4；廣瀨薰雄，〈敦煌漢簡中所見韓安國受賜醫藥方的故事〉，《中醫藥文化》，第13卷第1期(上海，2018.02)，頁47-51。

4B,《甲編》19B)。⁸²

以上，是一方兩面抄寫隧卒疾病、治療和病情等狀的木牘，大概便於邊地管理基層戍卒的人力。至於醫藥方，則僅見少數殘簡，如：

傷寒四物：烏喙十分、細辛六分、朮十分、桂四分，以溫湯飲一刀割，日三，夜再行，解不出汗。(《合校》89.20；《甲編》509)⁸³

又如，破城子遺址發現的木簡上有：

●治除熱方：貝母一分桔更三分□(E.P.T. 10：8)⁸⁴

或玉門關發現的漢簡：

葶癸卅枚，黃連五斤，莖宛五斤⁸⁵

這類文本從其前後脈絡視之，可能像廣瀨薰雄研究指出的，是醫方書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仍和前類「病書」或「病名籍」有關，是邊地官醫「書其所以」的報告中的部分。

晚近值得注意的還有敦煌懸泉置遺址的出土，懸泉置遺址位於敦煌和安西兩市縣交界處，東去安西(唐瓜州)60公里，西距敦煌(唐沙州)64公里，現屬敦煌市五墩鄉管轄，安(西)敦(煌)公路從此通過。遺址位於山前衝擊扇緩坡臺地上，海拔170公尺左右。遺址地處交通要害之處，又有水源供給，是兩漢時期，特別在西漢，是東西交通大動脈的重要中轉站。但漢代文獻無任何記述，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唐代文獻《元和郡縣圖志》和敦煌遺書及其引文。經調查，該遺址包括主體建築、灰區、馬廄及其附屬建築，總占地面積22500平方公尺。被沙礫塵土覆蓋的遺址因地處山澗溝口處，經長期山洪沖刷，被

⁸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甲，圖版玖，肆、釋文，頁2；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5；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簿籍類，二、籍，(二七)病名籍，頁385-386。

⁸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甲，圖版伍壹，肆、釋文，頁66；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頁156。

⁸⁴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5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圖版，頁46。

⁸⁵ 敦煌市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玉門關漢簡》(上海：中西書局，2019)，彩色圖版，98DYC：42，頁60。

分隔成東西兩半。從出土簡牘文書考察，懸泉置的創建約在漢武帝元鼎年間(公元前 116-111 年)，其中的漢代文化層可分早(漢武至昭帝)、中(宣帝至東漢初)，及晚(東漢中晚期)三期。該遺址經發掘，出土各類文書 7 萬餘件，其中有 2 萬多枚漢代簡牘、10 份帛書、10 張紙文書及 1 幅牆壁題記。但目前已公佈的資料尚未觸及報告所言的醫藥方。因此，尚待資料進一步公開後始能得知。⁸⁶

檢視戰國晚期至兩漢的方技相關文本，可以發現，他們的書寫也具有多人書寫，不盡成之於一時的特色，反映書寫的環境可能相對開放，人際的互動相對複雜；這類文本的編次，並未嚴守以類相從的原則，和經過校書者整理，《漢書·藝文志》所呈現的圖書面貌，仍有相當差距。同時也反映，基於不同的實務需求，醫療相關文本的存在和流通形式可能比傳世文本內容所書載的更為複雜和富於彈性。

四、結語

這篇論文檢視出土古代醫療相關方術文本的脈絡、形制、字跡、內容，暨其書寫、編次與體裁後發現：一、這類文本常由多人參與書寫，一人獨立書寫的案例反而相對罕見。多人書寫的情況又可分為兩種：(一)是在同一材質上接續書寫，但未必都在短時間內一氣呵成；(二)是在不同形制的載體上分別書寫，然後再加以組綴編聯。換言之，書寫能力固然是參與這類文本建構的基本門檻，但文本並不總在密而不宣的封閉環境下，而是在某種相對開放的人際網絡中，甚至是在書手彼此互動、相互知情的情況下形成的。二、相關文本的編次往往視實際需要處置，未必拘於一律。有的以個別牘版書載單方行世，有的以合方聯編或合卷成書形式流通，有的則與非關醫療的文本合寫一處以便閱覽或皮藏。這些現象除了一定程度反映醫療實務的需求多端、醫療相關知識的流通樣態多元，也說明文本體裁間的界限往往是浮動

⁸⁶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文物》，第5期(北京，2000.05)，頁4-2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漢簡內容概述〉，《文物》，第5期(北京，2000.05)，頁21-26；中國文物研究所胡平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的、具有因事制宜色彩，不盡與兩漢之交由國家主導形成的圖書分類架構一致。三、根據文本的形制與流通情況及《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淳于意的證言推測，醫療相關文本的閱讀、理解、應用、驗證至少可能存在兩類作法：(一)在師資引導下，由弟子亦步亦趨學習、討教為之；(二)由能夠識讀圖像、文字者自主理解、體會，並據此運用、檢討。總之，以往我們較少從具體的出土實物出發，著眼於醫療相關文本的書寫、編次和體裁，以探討知識的傳授與流動問題。透過上述的說明，本文則希望可以呈現古代醫療技術、知識的不同存在形式，傳授或流動的不一樣態。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傳統史料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綿陽博物館編，《綿陽雙包山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6。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長沙：嶽麓書社，2016。
-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 敦煌市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玉門關漢簡》，上海：中西書局，2019。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
-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簡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歐陽詢等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鄭玄注，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二) 近人論著

- 丁山，〈說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2分(北平，1930.01)，附錄二〈說夢〉，頁245-247。
- 丁媛、張如青，〈張家界古人堤出土醫方木牘「治赤穀方」考釋〉，《中華醫史雜誌》，第41卷第4期(北京，2011.07)，頁240-242。
-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洪趙縣坊堆村古遺址墓群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第4期(北京，1955.04)，頁46-54。
- 工藤元男撰，陳偉譯，〈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構造與系統〉，《人文論叢》，2001年卷(武漢，2002.10)，頁78-93。
-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文物》，第12期(北京，2017.12)，頁48-57。
- 中國文物研究所胡平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武威漢代醫藥簡牘在醫學史上的重要意義〉，《文物》，第12期(北京，1973.12)，頁23-29。
- 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第4期(北京，1988.04)，頁36-47。

- 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詩經》〉，《文物》，第8期(北京，1984.08)，頁1-12。
- 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第2期(北京，1983.02)，頁21-23。
- 方勇，〈談關沮秦簡所載秦代的浴蠶術〉，《社會科學戰線》，第3期(長春，2018.03)，頁265-269。
- 方勇、侯娜，〈讀周家臺秦簡「醫方」簡札記(二則)〉，《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3期(煙台，2015.05)，頁52-54。
- 方勇、胡潤怡，〈讀秦醫方簡札記二則〉，《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第34卷第7期(長春，2015.07)，頁89-71。
- 方懿林、周祖亮，〈《里耶秦簡(壹)》醫藥資料初探〉，《中醫文獻雜誌》，第6期(上海，2012.12)，頁10-13。
-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王玉興，〈關於《黃帝內經太素》的傳流概況〉，《天津中醫學院學報》，第9卷第4期(天津，1990.08)，頁36-37。
-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 王勇，〈五行與夢占——嶽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的占夢術〉，《史學集刊》，第4期(長春，2010.07)，頁29-33。
- 王貴元，〈周家台秦墓簡牘釋讀補正〉，《考古》，第2期(北京，2009.02)，頁70-74。
- 王愷、胡東波，〈北京大學藏簡牘編繩的顯微分析〉，《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第24卷第4期(上海，2012.11)，頁55-65。
- 王輝，〈秦曾孫駟告華大山明神文考釋〉，《考古學報》，第2期(北京，2001.04)，頁143-158。
- 王興伊，〈張家界古人提出土木牘「治赤穀方」源自西域烏孫考〉，《圖書館雜誌》，第10期(上海，2018.10)，頁110-115。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第6期(北京，2011.06)，頁49-56。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室內發掘清理簡報〉，《文物》，第6期(北京，2012.06)，頁32-44。
- 史志龍，〈秦「祠先農」簡再探〉，《簡帛》，第5輯(2010)。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文物》，第5期(北京，2000.05)，頁4-20。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漢簡內容概述〉，《文物》，第5期(北京，2000.05)，頁21-26。
-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旱灘坡漢墓發掘簡報——出土大批醫

- 藥簡牘》，《文物》，第12期(北京，1973.12)，頁18-21。
- 田天，〈北大秦簡《祓除》初識〉，《簡帛》，第8輯(上海，2013.10)，頁43-48。
- 田天，〈北大藏秦簡「醫方雜抄」初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4卷第5期(北京，2017.05)，頁52-57。
- 田天，〈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的性質和擬名問題〉，《簡帛》，第8輯(上海，2013.12)，頁17-27。
- 田旭東，〈秦簡中的「祠五祀」與「祠先農」〉，《西部考古》，第1期(西安，2016.12)，頁217-224。
-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第8期(北京，1978.08)，頁12-30。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第7期(北京，2014.07)，頁59-70。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12輯(成都，2016.03)，頁215-246。
- 朱玲，〈《萬物》與《五十二病方》的藥物學比較〉，《中醫藥學報》，第35卷第5期(哈爾濱，2007.10)，頁49-50。
- 朱玲、楊峰，〈睡虎地秦簡《日書》醫療疾病史料淺析〉，《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第13卷第5期(北京，2007)，頁388-389。
- 朱鳳瀚、韓巍、陳侃理，〈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第6期(北京，2012.06)，頁65-73。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文物》，第11期(北京，2018.11)，頁87-96。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市新建區博物館，〈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第7期(北京，2016.07)，頁45-62。
- 何琳儀，〈新蔡竹簡選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3期(合肥，2004.05)，頁1-11。
- 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嶽麓書社，2000。
- 吳郁芳，〈包山二號墓墓主昭佗家譜考〉，《江漢論壇》，第11期(1992.11)，頁62-64。
- 吳郁芳，〈包山楚簡卜禱簡牘釋讀〉，《考古與文物》，第2期(北京，1996.02)，頁75-77。
- 呂亞虎，〈秦簡中的浴蠶術及其相關俗信發微〉，《中國農史》，第5期(南京，2020.10)，頁11-20。
- 呂亞虎，〈試論秦漢時期的祠先農信仰〉，《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5期(南昌，2013.10)，頁103-111。
- 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發掘簡

- 報》，《文物》，第6期(北京，1976.06)，頁1-10。
- 宋超，〈先農與神農炎帝——以里耶、周家台秦簡為中心的討論〉，收入霍彥儒主編，《炎帝、姜炎文化與民生》，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頁60-70。
- 宋鎮豪，〈甲骨文中的夢與占夢〉，《文物》，第6期(北京，2006.06)，頁61-71。
- 李天虹、華楠、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詁咎》篇與睡虎地秦簡《日書·詁》對讀〉，《文物》，第8期(北京，2020.08)，頁53-59。
- 李天虹、華楠、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詁咎》篇與睡虎地秦簡《日書·詁》對讀〉，《文物》，第8期(北京，2020.08)，頁53-59。
- 李守奎，〈包山卜筮文書書迹的分類與書寫的基本狀況〉，《中國文字研究》，第1輯(上海，2007.09)，頁63-67。
- 李戎，〈居延漢簡醫、藥、傷、病簡文整理研究報告〉，《醫古文知識》，第4期(上海，2001.11)，頁15-18。
- 李均明，《古代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李志芳、蔣魯敬，〈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西漢墓地M12出土簡牘概述〉，《考古》，第2期(北京，2020.02)，頁21-33。
- 李志芳、蔣魯敬，〈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西漢墓地M12出土簡牘概述〉，《考古》，第2期(北京，2020.02)，頁21-33。
- 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2分(臺北，2001)，頁339-391。
- 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2分，頁339-391。
- 李建民，〈中國早期數術通考〉，《法國漢學》，第6輯(北京，2002.04)，頁68-77。
- 李建民，〈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新視野〉，《新史學》，第15卷第3期(臺北，2004)，頁203-225。
- 李建民，〈禁方書、聖人與正典〉，《讀書》，第8期(北京，2003.08)，頁64-70。
- 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
-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
- 李建民，《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9。
- 李家浩，〈秦玉版銘文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2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04)，頁99-128。
- 李家浩、楊澤生，〈北京大學藏漢代醫簡簡介〉，《文物》，第6期(北京，2011.06)，頁88-89。
- 李國強，〈周家臺「祠先農」簡的釋、譯與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夏之卷(北京，2016.05)，頁80-100。

- 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說「黃老」〉，俱收入《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30-31、280-282。
- 李零，〈北大藏秦簡「禹九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4卷第5期(北京，2017.05)，頁42-52。
- 李零，〈秦禱病玉版的研究〉，《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525-548。
- 李零，〈戰國秦漢方士流派考〉，收入《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97-128
-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 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 李蜜，〈睡虎地《日書》《病》、《有疾》篇新研——自中國醫學思想史角度的再考察〉，《北大史學》，第16期(北京，2011.12)，頁1-15。
- 李銳，〈清華簡〈傳說之命〉研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6期(深圳，2013.11)，頁68-72。
- 李學勤，〈《素問》七篇大論的文獻學研究〉，《燕京學報》，第2期(北京，1996)，頁295-302
- 李學勤，〈由清華簡《金縢》看周初史事〉，《中國經學》，第8輯(西寧，2011.06)，頁1-5。
- 李學勤，〈由清華簡《金縢》看周初史事〉，《中國經學》，第8輯(南寧，2011.06)，頁1-5。
- 李學勤，〈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考古學報》，第1期(北京，1958.03)，頁43-74。
- 李學勤，〈秦玉牘索隱〉，《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北京，2000.04)，頁41-45。
- 李學勤，〈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郢都〉，《江漢考古》，第2期(武漢，2011.04)，頁108-109。
-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第3期(北京，2011.03)，頁70-74。
-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第3期(北京，2011.03)，頁70-74。
- 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史學史研究》，第2期(北京，2011.06)，頁104-109。
- 李學勤，〈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北京，2009.05)，頁5-6。
- 李學勤，〈試論楚簡中的〈說命〉佚文〉，《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第21卷第2期(煙台, 2008.04), 頁89-90。
- 李學勤, 〈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 《文物參考資料》, 第11期(北京, 1956.11), 頁16-17。
- 李學勤, 〈論葛陵楚簡的年代〉, 《文物》, 第7期(北京, 2004.07), 頁67-70。
- 李學勤, 〈關於甲骨的基礎知識〉, 《歷史教學》, 第7期(天津, 1959.07), 頁20-22。
- 李學勤、彭裕商,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杜正勝, 《從眉壽到長生: 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 臺北: 三民書局, 2005。
- 杜勇, 〈清華簡《金縢》有關歷史問題考論〉,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第2期(長春, 2012.03), 頁61-68。
- 沈剛, 〈秦代祠先農制度及其流變〉, 《出土文獻研究》, 第12輯(上海, 2013.12), 頁168-180。
- 辛德勇,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 《出土文獻》, 第4輯(上海, 2013.12), 頁177-278。
- 邢義田, 〈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史料解讀之一〉, 收入邢義田、劉增貴主編,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古代庶民社會》, 臺北: 中央研究院, 2013, 頁286-288。
- 周公廟遺址的考古報告見周原考古隊, 2003年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 《古代文明》, 第5輯(北京, 2006), 頁151-187。
- 周波, 〈里耶秦簡醫方校讀〉, 《簡帛》, 第15輯(上海, 2017.11), 頁41-54。
- 周祖亮、方懿林, 〈居延新簡所記醫藥信息述略〉, 《中醫文獻雜誌》, 第2期(上海, 2011.04), 頁1-4。
- 周祖亮、方懿林, 《簡帛醫藥文獻校釋》, 北京: 學苑出版社, 2014。
- 周琦, 〈張家界古人堤醫方木牘「治赤散方」新證〉, 《出土文獻研究》, 第16輯(上海, 2017.09), 頁297-304。
- 周鳳五, 〈《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版》新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72本第1分(臺北, 2001), 頁217-232。
- 季勛, 〈雲夢睡虎地秦簡概述〉, 《文物》, 第5期(北京, 1976.05), 頁1-6。
- 尚志鈞, 〈從醫藥角度探討《萬物》與《山海經》的時代關係〉, 《中醫臨床與保健》, 第1卷第3期(合肥, 1989.10), 頁47-50。
- 房相楠, 〈小談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它》中的短語〉, 《唐山學院學報》, 第25卷第4期(唐山, 2012.07), 頁52-53。
- 房德鄰, 〈清華簡《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是偽作〉, 《故宮博物院院刊》, 第6期(北京, 2013.06), 頁41-51。
- 林富士, 〈「祝由」釋義: 以《黃帝內經·素問》為核心文本的討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83本4分(臺北, 2012), 頁671-738。

- 林富士，《漢代的巫者》；《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 林澐，〈從武丁時代的幾種「子卜辭」試論商代的家族形態〉，《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08)，頁314-336。
- 邴尚白，《葛陵楚簡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
-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 侯乃峰，〈秦駟禱病玉版銘文集解〉，《文博》，第6期(西安，2005.12)，頁69-75。
- 姚萱，〈非王卜辭的「瘳」補說〉，《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4期(石家莊，2012.07)，頁108-113。
- 柳長華等，〈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的命名與學術源流考〉，《文物》，第12期(北京，2017.12)，頁58-69。
- 段渝，〈卜用甲骨的用後處理〉，《文史知識》，第1期(北京，1993.01)，頁23-26。
- 紀婷婷、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1039號簡所記辟兵術考〉，《文物》，第8期(北京，2020.08)，頁65-69。
- 紀婷婷、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醫方雜識〉，《江漢考古》，第1期(武漢，2020.01)，頁118-123。
- 胡平生、韓自強，〈《萬物》略說〉，《文物》，第4期(北京，1988.04)，頁48-54。
-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簡論〉，《文物》，第8期(北京，1984.08)，頁13-21。
-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胡厚宣，〈殷人占夢考〉，收入《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臺北：大通書局影1944年齊魯大學本，1972，頁447-466。
-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 范新俊，〈敦煌漢簡醫方用藥小議〉，《上海中醫藥雜誌》，第9期(上海，1990.09)，頁39。
- 韋昭註，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夏含夷，〈說杼：清華簡《程寤》篇與最早的中國夢〉，《出土文獻》，第13輯(上海，2018.10)，頁84-90。
- 孫占宇、魯家亮，《放馬灘秦簡及岳麓秦簡《夢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
- 孫其斌、蘇建兵，〈《居延新簡》中的醫藥簡〉，《甘肅中醫》，第15卷第4期(蘭州，2002.08)，頁17-19。
-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徐錫臺，〈周原出土卜辭選釋〉，《出土文獻研究》，第一輯(上海，1985.06)，頁

64。

- 徐錫臺編著，《周原甲骨文綜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 晁福林，〈春秋時期的夢與占夢〉，《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煙台，1995.09)，頁8-15。
- 晏昌貴，〈秦家嘴「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1期(武漢，2005.01)，頁10-13。
- 翁宇翔，〈秦駟玉版「忡、懣、惑、卷」并釋〉，《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6期(曲阜，2007.06)，頁119-120。
- 翁明鵬，〈嶽麓秦簡《占夢書》抄寫年代考辯〉，《中國文字研究》，第30輯(上海，2019.12)，頁84-93。
- 耿鑑庭，〈漢簡裡的醫藥疾病資料〉，《江西中醫藥》，第4期(1957.04)，頁59-62
-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第1期(北京，1985.01)，頁1-8。
- 荊州地區博物館、彭浩，〈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大批珍貴竹簡〉，《江漢考古》，第2期(武漢，1985.07)，頁1-3。
-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墓地M12發掘簡報〉，《考古》，第2期(北京，2020.02)，頁3-20。
-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墓地M12發掘簡報〉，《考古》，第2期(北京，2020.02)，頁3-20。
- 荊沙鐵路考古隊，〈江陵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第2期(武漢，1988.02)，頁36-43。
-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第10期(北京，1979.10)，頁27-37。
-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西周甲骨文〉，《文物》，第10期(北京，1979.10)，頁38-43。
- 馬繼興，〈從《素問》王注探討《靈樞經》在唐代之三種古傳本〉，《天津中醫學院學報》，1986增刊(1986)，頁101-113，收入《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77-85。
- 高一致，〈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補釋(五則)〉，《江漢考古》，第1期(武漢，2016.01)，頁109-112。
- 張延昌主編，《武威漢代醫簡注解》，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
- 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第1期(北京，1977.01)，頁36-39。
- 張春龍，〈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簡牘學研究》，第6輯(蘭州，2016.06)，頁1-7。
- 張春龍、楊先雲，〈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續(上)〉，《簡牘學研究》，

- 第7輯(蘭州, 2018.09), 頁146-157。
-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 《文物》, 第1期, (北京, 1985.01), 頁10-15。
- 張國碩, 〈試論殷人對甲骨的處置方式〉, 《殷都學刊》, 第2期(安陽, 2003.06), 頁19-23。
- 張朝陽, 〈中國已發現最古醫方: 里耶秦簡之醫方簡略考〉, 《唐都學刊》, 第32卷第5期(西安, 2016.09), 頁69-74。
- 張華撰, 范寧校證, 《博物志校證》,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
- 張雷, 〈赤穀方考〉, 《甘肅中醫藥大學學報》, 第33卷第3期(蘭州, 2016.06), 頁114-116。
- 張雷, 〈周家臺秦簡「馬心」考〉, 《中國文字學報》, 第8輯(北京, 2017.12), 頁144-145。
- 梁繁榮等, 〈成都老官山出土經穴髹漆人像初探〉, 《中國針灸》, 第35卷第1期(北京, 2015.01), 頁91-93。
- 梁繁榮等編, 《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 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 成都: 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6。
- 莫伯峰, 〈殷商祖甲改革與貞人「何」〉,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第8輯(上海, 2019), 頁96-133。
- 許進雄, 《甲骨上鑿鑿形態的研究》,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79。
- 許慎撰, 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許道勝, 〈天星觀1號楚墓卜筮禱祠簡釋文校正〉,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22卷第3期(長沙, 2008.05), 頁8-14。
- 許道勝, 〈江陵望山楚簡研究述評〉,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19卷第5期(長沙, 2005.09), 頁11-19。
- 連劭名, 〈包山楚簡占卜文書新證〉, 《中原文物》, 第2期(鄭州, 2016.04), 頁60-64。
- 連劭名, 〈江陵張家山漢簡《引書》述略〉, 《文獻》, 第2期(北京, 1991.07), 頁256-263。
- 連劭名, 〈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初探〉, 《文物》, 第7期(北京, 1989.07), 頁75-81。
- 連劭名, 〈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簡文研究〉,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1期(北京, 2001.06), 頁49-57。
- 連劭名, 〈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簡文研究補正〉,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2期(北京, 2001.12), 頁52-54。
- 連劭名, 〈雲夢秦簡《詁》篇考述〉, 《考古學報》, 第1期(北京, 2002.01), 頁

23-38。

連劭名，〈睡虎地秦簡《日書》及《詁》篇補證〉，《江漢考古》，第1期(武漢，2001.03)，頁78-79。

郭明，〈周原鳳雛甲組建築H11「龜室說」質疑——兼論商周時期甲骨埋藏問題〉，《四川文物》，第6期(成都，2014.12)，頁32-38。

陳力，〈對阜陽漢簡《萬物》所載藥物與疾病的整理〉，《湖南中醫學院學報》第2期(長沙，1991.02)，頁53-55。

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成都，1982.05)，頁305-434。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陳侃理，〈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第6期(北京，2012.06)，頁90-94。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空白頁」及相關問題〉，《文物》，第5期(北京，2008.05)，頁75-80。

陳松長，〈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第3期(北京，2009.03)，頁75-88。

陳松長等著，《嶽麓書院藏秦簡的整理與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4。

陳紅梅，〈馬王堆醫書抄錄年代研究概況〉，《中醫文獻雜誌》，第6期(上海，2009.12)，頁50-52。

陳偉，〈望山楚簡所見的卜筮與禱祠——與包山楚簡相對照〉，《江漢考古》，第2期(武漢，1997.04)，頁73-75。

陳偉，〈新蔡楚簡零釋〉，《華學》，第6輯(北京，2003.06)，頁95-98。

陳偉，〈葛陵楚簡所見的卜筮與禱祠〉，《出土文獻研究》，第6輯(上海，2004)，頁34-42。

陳偉，〈試論包山楚簡所見的卜筮制度〉，《江漢考古》，第1期(武漢，1996.02)，頁86-89。

陳偉，〈嶽麓書院秦簡考校〉，《文物》，第10期(北京，2009.10)，頁85-87。

陳偉，〈讀嶽麓秦簡《占夢書》札記〉，《簡帛》，第9輯(上海，2014.10)，頁157-162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

陳筱芳，〈春秋夢兆信仰〉，《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5期(成都，2007.05)，頁110-114。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56。

陳耀鈞、閻頻，〈江陵張家山漢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第12期(北京，1985.12)，頁1124-1129。

- 單曉偉，〈秦駟玉版「靡有(微-彳)休」試解〉，《漢語言文字研究》，第1輯(上海，2015)，頁334-338。
- 喻遂生，〈《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疾」字〉，《蘭州學刊》，第10期(蘭州，2009.10)，頁158-160。
- 喻遂生、鄒淵，〈甲骨文兩段式命辭對貞句的組合形式及語義指向〉，《漢字漢語研究》，第3期(鄭州，2019.09)，頁3-17。
- 彭浩，〈讀里耶「祠先農」簡〉，《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上海，2007.11)，頁18-24。
- 曾憲通、楊澤生、尚毅，〈秦駟玉版文字初探〉，《考古與文物》，第1期(西安，2001.01)，頁49-54。
- 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第1期(北京，1982.01)，頁71-116。
- 湖南考古文物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與出土簡牘概述〉，《中國歷史文物》，第2期(北京，2003.04)，頁66-71。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中國歷史文物》，第2期(北京，2003.04)，頁72-84。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
- 程文文，〈從文獻學角度考張家山漢墓醫書成書時代〉，《中醫藥文化》，第4期(上海，2017.08)，頁15-19。
- 程浩，〈「書」類文獻辨析〉，《出土文獻》，第8輯(上海，2016.04)，頁139-145。
- 程浩，〈清華簡《金縢》性質與成篇辯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4期(上海，2013.08)，頁88-95。
- 馮華，〈卜筮簡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第2期(北京，2012.04)，頁3-8。
- 馮華，〈包山楚簡成套卜筮辭中的「習卜」研究〉，《中國史研究》，第1期(北京，2012.03)，頁5-18。
- 黃天樹，〈關於非王卜辭的一些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4期(西安，1995.12)，頁125-131。
- 黃湛，〈簡本、傳世本《金縢》校釋——兼論文本流變與詮釋〉，《中國經學》，第25輯(桂林，2019.12)，頁39-52。
- 黃菊珍，〈舍泰父而擇先農——由《關沮秦漢墓簡牘》看臘、蠟合一〉，《咸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1期(咸陽，2009.01)，頁10-12。
- 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第9期(北京，2017.09)，頁54-59。
- 黃龍祥，〈老官山出土西漢針灸木人考〉，《中國針灸》，第47卷第3期(北京，2017.05)，頁131-144。

- 黃騰輝，〈兩張漢簡醫方的啟示〉，《上海中醫藥雜誌》，第4期(上海，1988.04)，頁35。
- 廉莊，〈海昏侯墓中的醫藥發現〉，《家庭中醫藥》，第4期(北京，2016.04)，頁11-13。
- 廉超，〈嶽麓書院藏秦簡《夢書》研究綜述〉，《簡帛研究》，秋冬號(桂林，2020.01)，頁317-323。
- 楊勇，〈流動中的病方：戰國秦漢時期病方的流傳與命名〉，《人文論叢》，第2期(武漢，2015.12)，頁112-120。
- 楊振紅，〈從清華簡《金縢》看《尚書》的傳流及周公歷史記載的演變〉，《中國史研究》，第3期(北京，2012.08)，頁47-63。
- 楊華，〈出土日書與楚地的疾病占卜〉，《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6卷第5期(武漢，2003.09)，頁564-570。
- 萬方、鍾贛生，〈《萬物》與《五十二病方》有關藥物內容的比較〉，《中國醫藥學報》，第5卷第2期(北京，1990.04)，頁55-58。
- 葛英會，〈談岐山周公廟甲骨〉，《古代文明》，第五卷(北京，2006年)，頁193-196。
- 董作賓，〈五等爵在殷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3分(南京，1936)，頁413-430。
- 董源，〈《萬物》中部分植物名稱古今考〉，《中國科技史料》，第16卷第4期(北京，1995)，頁77-83。
- 裘錫圭，〈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名稱和醫藥情況〉，《中醫藥文化》，第6期(上海，2008.12)，頁16-19。
- 賈連敏，〈新蔡葛陵楚簡中的祭禱文書〉，《華夏考古》，第3期(鄭州，2004.09)，頁89-101。
- 廖名春，〈清華簡《說命中》的內容與命名〉，《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4期(揚州，2014.07)，頁84-86。
- 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文史哲》，第6期(濟南，2010.11)，頁120-125。
- 廖育群，〈今本《黃帝內經》——《素問》與《靈樞》〉，收入《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頁51-76。
- 暢文齊、顧鐵符，〈山西趙洪縣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參考資料》，第7期(北京，1956.07)，頁27。
- 種建榮，〈試論西周甲骨的埋藏方式——以周公廟刻辭甲骨的出土為例〉，《文博》，第3期(西安，2018.06)，頁21-27。
-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5。
- 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
- 趙友琴，〈流沙墜簡中敦煌醫方簡初探〉，《上海中醫藥雜誌》，第11期(上海，

- 1986.11), 頁48-49。
- 趙宇明、劉海波、劉掌印,〈《居延漢簡甲乙編》中醫藥史料〉,《中華醫史雜誌》,第24卷第3期(北京,1994.07),頁163-166。
- 趙曉斌,〈荊州棗林鋪楚墓出土卜筮祭禱簡〉,《簡帛》,第19輯(上海,2019.11),頁21-28。
- 趙藝蓬等,〈西周甲骨文的皮藏問題初探〉,《文博》,第5期(西安,2018.10),頁58-63。
- 趙鵬,〈關於疾病、夢幻類卜辭的幾點思考〉,《出土文獻研究》,第18輯(上海,2019.12),頁1-15。
- 趙鵬,〈關於疾病、夢幻類卜辭的幾點思考〉,《出土文獻研究》,第18輯,頁1-15。
- 劉一曼,〈安陽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關問題〉,《考古》,第5期(北京,1997.05),頁51-61。
- 劉一曼,〈論殷墟甲骨的埋藏狀況及相關問題〉,《三代考古》,(北京,2004),頁354-370。
- 劉金華,〈周家臺秦簡醫方試析〉,《甘肅中醫》,第20卷第6期(蘭州,2007.06),頁24-26。
- 劉金華,〈讀阜陽漢簡《萬物》綴合三題〉,《華中國學》,第7卷(武漢,2016),頁41-45。
- 劉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以及相關問題〉,《長江大學學報》,第1期(荊州,2004.02),頁5-8。
- 劉建民,〈讀《里耶秦簡(壹)》醫方簡札記〉,《簡帛》,第11輯(上海,2015.11),頁111-115。
- 劉昭瑞,〈秦禱病玉簡、望祭與道教投龍儀〉,《四川文物》,第2期(成都,2005.04),頁44-47。
- 劉國忠,〈從清華簡《金縢》看傳世本《金縢》的文本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北京,2011.07),頁40-43。
- 劉國忠,〈清華簡《傳說之命》夢境試析〉,《出土文獻》,第6輯(上海,2015.04),頁176-183。
- 劉國城,〈李學勤先生與清華簡的入藏〉,《書與畫》,第4期(上海,2019.04),頁63-66。
- 劉國強,〈清華簡與古代文史研究〉,《文史知識》,第3期(北京,2012.03),頁5-12。
- 劉彬徽,〈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楚文化研究論集》,第7集(長沙,嶽麓書社,2007)。
- 劉樂賢,〈從周家臺秦簡看古代的「孤虛」術〉,《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

- 2005.11), 頁50-56。
- 劉樂賢, 〈漢簡中的占夢文獻〉, 《文物》, 第9期(北京, 2017.09), 頁70-73。
- 劉樂賢, 〈睡虎地秦簡日書《詁咎篇》研究〉, 《考古學報》, 第4期(北京, 1993.10), 頁435-454。
- 劉樂賢,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1994。
- 劉樂賢, 《簡帛數術文獻探論》,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劉麗, 〈北大藏秦簡《制衣》簡介〉,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52卷第2期(北京, 2015.03), 頁43-48。
- 劉麗, 〈北大藏秦簡《制衣》釋文注釋〉,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54卷第5期(北京, 2017.05), 頁57-62。
- 廣瀨薰雄, 〈敦煌漢簡中所見的韓安國受賜醫藥方的故事〉, 收入《簡帛研究論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頁508-515。
- 廣瀨薰雄, 〈敦煌漢簡中所見韓安國受賜醫藥方的故事〉, 《中醫藥文化》, 第13卷第1期(上海, 2018.02), 頁47-51。
- 蔣魯敬、李志芳, 〈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M12出土的簡牘〉, 《出土文獻研究》, 第18輯(上海, 2019.12), 頁168-182。
- 蔣魯敬、李志芳, 〈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M12出土的簡牘〉, 《出土文獻研究》, 第18輯(上海, 2019.12), 頁168-182。
- 蔣豔, 〈周家臺簡379的編聯及相關未釋字的釋讀〉, 《中醫藥文化》, 第15卷第4期(上海, 2020.08), 頁92-96。
- 魯家亮, 〈嶽麓秦簡《占夢書》零拾〉, 《江漢考古》, 第3期(武漢, 2014.06), 頁119-121。
- 錢存訓著, 國家圖書館編, 《錢存訓文集》,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 錢超塵、溫長路, 〈張仲景生平暨《傷寒論》版本流傳考略〉, 《河南中醫》, 第25卷第1期(鄭州, 2005.01), 頁3-7。
- 龍永芳, 〈古代孤虛術小議——兼論周家臺秦簡中的孤虛法〉, 《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第22卷第2期(荊門, 2007.02), 頁85-89。
- 龍伯堅, 《黃帝內經概論》,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0。
- 謝妍、沈澍農, 〈周家臺「病方」疾病名研究〉, 《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18卷第4期(南京, 2017.12), 頁215-217。
- 謝妍、沈澍農, 〈周家臺秦簡〈病方〉「乾者」考〉, 《中華中醫藥雜誌》, 第34卷第1期(北京, 2019.01), 頁72-74。
- 謝科峰, 〈清華簡《金縢》研究三題〉, 《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 第1期(2019.01), 頁79-84。
- 韓巍, 〈北大秦簡《算書》土地面積類算題初識〉, 《簡帛》, 第8輯(上海, 2013.10),

頁29-42。

韓巍，〈北大秦簡中的數學文獻〉，《文物》，第6期(北京，2012.06)，頁85-89。

韓巍，〈北大藏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2卷第2期(北京，2015.03)，頁29-36。

羅福頤，〈祖國最古老的醫方〉，《文物參考資料》，第9期(北京，1956.09)，頁31。

龐壯城，〈嶽麓簡《占夢書》零釋兼論其成書機制〉，《學行堂語言文學論叢》，第4輯(成都，2013.10)，頁60-89。

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收入《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香港：中華書局，1993)，頁405-454。

(三)、中文論文

王明娟，〈清華簡《說命》集釋〉，合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6。

王美杰，〈秦駟玉版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王章睿，〈《左傳》夢例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王錦成，〈《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文字整理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申超，〈清華簡與商周若干史事考釋〉，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朱曉雪，〈包山楚墓文書簡、卜筮祭禱簡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周佳琳，〈清華簡《傳說之命》研究〉，濟南：濟南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邱亮，〈嶽麓書院藏秦簡(一)語言文字研究〉，吉首、張家界：吉首大學漢語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孫非，〈《黃帝內經》年代學研究〉，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文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馬芳，〈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貳)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3。

馬翠，〈清華簡《說命》集釋〉，保定：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16。

張秋芳，〈甲骨卜辭中夢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11。

強晨，〈清華簡與西周開國史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許莉莉，〈清華簡所見商末周初史事初探〉，煙臺：煙臺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陳垠昶，〈嶽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

- 士學位論文，2013。
- 陳振華，〈《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字形與書法研究〉，吉首、張家界：吉首大學漢語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 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16。
- 祿書果，〈清華簡「書」類文獻整理與研究〉，鄭州：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
- 賈旭東，〈清華簡〈傳說之命〉綜合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古漢語文字學碩士論文，2016。
- 路懿菡，〈清華簡與西周若干問題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 臧磊，〈《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校注〉，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 劉珏，〈《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文字研究與文字編〉，長沙：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3。
- 劉豔，〈先秦兩漢占夢現象的文化考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 蔡麗利，〈新蔡葛陵楚墓卜筮簡集釋〉，長春：吉林大學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 蔡麗利，〈楚卜筮簡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 盧醒辰，〈楚簡所見卜筮祭祀研究〉，重慶：西南大學考古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 謝科峰，〈早期古書流傳問題研究——以相關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比較為例〉，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 顧覺民，〈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版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

(四)、英文論著

- Allan, Sarah. "On Shu 書 (Documents) and the Origin of the Shang Shu 尚書 (Ancient Documents) in Light of Recently Discovered Bamboo Slip Manuscript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5, no.3 (2012): 547-557.
- . *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 Harper, Donald.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 Manuscript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 . “Physicians and Diviners: The Relation of Divination to the Medicine of the Huangdi neijing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Thearch).” *Divination et rationalité en Chine ancienn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1 (1999): 91-110.
- Keegan, David. *The ‘Huang-ti nei-ch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pil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ruc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h. D Dissertation, 1988.
- Sivin, Nathan. “State, Cosmos, 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 C.”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 no.1 (1995): 5-37.

(五)、日文著作

- 大形徹，〈《神農本草經》の神仙觀〉，《東方宗教》，第77期(茨城，1991.05)，頁22-49。
- 大形徹，〈本草と方士の関係について〉，《人文學論集(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第8期(大阪，1990)，頁47-66。
- 小川茂樹(貝塚茂樹)，〈殷代金文に見えた圖象文字叢に就いて〉，《東方學報》，第9冊(京都，1938.10)，頁55。
- 山田慶兒，〈《黃帝內經》の成立〉，《思想》，第8期(東京，1979.04)，頁94-108。
- 山田慶兒，〈《黃帝內經》——中國醫學の形成過程〉，收入《中國醫學の思想的風土》，東京：潮出版社，1995，頁47-75
- 山田慶兒，《中國醫學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1999。
- 山田慶兒，《本草と夢と鍊金術と——物質的想像力の現象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
- 山田慶兒，《夜鳴く鳥：醫學・呪術・傳説》，東京：岩波書店，1990。
- 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日書」における病因論と鬼神の關係について〉，《東方學》，第88輯(東京，1994.07)，頁33-53。
- 田天著，富嘉吟譯，〈北大秦簡祠祝書初探：兼ねて周家臺「病方簡」の構成に及ぶ〉，《學林》(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漢字文獻の現在」特集)，第62期(京都，2016.03)，頁131-151。
- 石田秀實，《中國醫學思想史——もう一つの醫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
- 貝塚茂樹，《中國古代史學の發展》，東京：弘文堂，1949。
- 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古亭書屋，1969。
- 湯淺邦弘，〈太姒の夢と文王の訓戒：清華簡〈程寤〉考〉，收入《竹簡學：中國

古代思想の探求》，大阪：大阪大學出版社，2014。
湯淺邦弘，〈岳麓秦簡《占夢書》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國研究集刊》，第57號(大阪，2013.12)，頁100-115。

(六)、網路資料

晏昌貴，〈天星觀「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修訂稿)〉(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http://47.75.114.199/show_article.php?id=31，2005年11月2日，瀏覽日期2020年10月23日。
陳民鎮、胡凱集釋，〈清華簡《金縢》集釋〉(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80/SrcShow.asp?Src_ID=1658，2011年9月20日首發，瀏覽日期2020年10月31日。
湖南考古文物研究所編，《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周波，〈《里耶秦簡(貳)》醫方校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28，2018年5月23日，瀏覽日期2020年10月23日。

Writing and Editing of Excavated Medical Manuscripts in Ancient China

Chin, Shih-ch'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way of transmission and circulation of medical technique and knowledge in ancient China. According to content analysis of existing texts,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medical mentee not only should be qualified by his mentor, but also should pay respect to his mentor and swear to keep those texts, techniques and knowledge he received in secret. However, the content of existing texts were mainly self-assertions composed by writers or owners of those text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way of circul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this study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examine and to compare the excavated context, physical material, format, handwriting, way of writing, editing and compilation of those excavated bamboo or wooden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Single medical texts were usually written during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y multiple scribes, who might or might not know each other, might or might not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ose texts were made available under a more or less open circumstances, rather than a closed, or secret condition. 2. The formats of medical texts varied, depending upon the tasks they tried to serve. For example, it could be a single prescription put down on a single wooden plate, it also could be hundred pieces of prescriptions on a volume of bamboo slips.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kind of texts could be bundled together indicates th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knowledge were blurred or flexible. 3. Based upon those facts mentioned above, there would be at least two ways of learning medical

techniques or knowledge, either instruction given by the mentor step by step, or spontaneous learning by the mentees. In sum, the format of excavated manuscripts displayed a far more complicated image of transmis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than what was presented in their content.

Keywords: text made of bamboo, slips and silk, medical activities, transmission of medicine

